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 「天下」概念：「後周魯」時代對世界 秩序的構想

佐藤將之*

〔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經過《荀子》和《呂氏春秋》「天下」一詞以及與此相關的概念（如「四海」等）的分析，試圖闡明《荀》、《呂》的思想特色及其歷史意義。在戰國諸子文獻中，《荀》、《呂》兩部文獻所呈現的政治思想之特色是異於其他戰國諸子文獻的論述。他者之主要意圖在於某個一國家，即所謂「諸侯國」的富強，《荀》、《呂》兩書政治理論的出發點並非單一國家的擴張，而是整個華夏世界的政治秩序，也就是「天下型國家」之建立。具體而言，筆者將試圖論證如下兩點：（一）荀子認為，任何國君只要達成荀子所要求的人格特質，就能成為「天下之君」。在以荀子所提倡的「義術」的實行為前提，荀子認為秦君也有充分資格在近未來能提升為「天下之君」的可能性。（二）《呂氏春秋》的論述則是在公元前256年開始的「無天子」世局為背景，《呂氏春秋》所界定的「天子」暗示秦主。因此，其論述主要鼓勵「天子」以「養身」、「求賢」、「至公」等較為「消極的」方式來獲得天下人民的擁戴。總之，在秦漢之後的「天下觀」應該經過《荀》、《呂》兩書中理論化的過程，在其理論層次也好，實行層次也好，才提升為包含能夠長期安定地治理廣闊的領土之意識形態的政治理論。

關鍵詞：天下觀、《荀子》、《呂氏春秋》、「天下」、「四海」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序言

本文的目的在於經過對《荀子》和《呂氏春秋》中「天下」一詞以及與此相關概念（如「四海」等）的分析，試圖闡明《荀》、《呂》的思想特色以及其歷史意義。在戰國諸子文獻中《荀》、《呂》兩部文獻所呈現的政治思想之特色，乃異於其他戰國諸子文獻之意圖在於某個一國家，即所謂「諸侯國」的富強。《荀》、《呂》兩書的政治理論的出發點並非單一國家的擴張，而是在於整個華夏世界的政治秩序，或者整體人類的社會秩序，¹也就是說，「天下型國家」之建立。²在此前提下，筆者期盼經過《荀》、《呂》兩書「天下」概念的探析來闡明兩書所構想由「天下之君」來治理的一種「世界國家」的論述結構、主張內容以及思想特色。

關於進行論述的程序，本文將在分析《荀》、《呂》文本中全部的「天下」（以及「四海」等相關）概念用例之基礎上進行論述。在進入本論之前，首先整理過去有關「天下」概念或所謂「中國天下觀」的主要成果以及其研究脈絡，並且評論過去主要研究針對中國戰國時期的、相關議題時的成果和觀點之一些問題和侷限。接著本文將分析《荀》、《呂》兩書中「天下」概念的用法和由此建構的主張內容以及其論述的意圖。³根據如上的探討，筆者將試圖論證的是如下三點：第一、《荀》、《呂》兩書的究竟目標皆並非單一國家的富強本身，而是一種「天下型國家」的建立。第二、荀子認為，任何國君只要達成荀子所要求的人格特質，就會能成為「天下之君」。⁴在此理路，以荀子所提倡的「義術」之實行為前提，

¹ 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中多次指出過這一點。今僅舉出如下一篇，請參見佐藤將之：〈《呂氏春秋》和《荀子》對「人類國家」構想之探析：以其「人」觀與「群」論為切入點〉，《政治科學論叢》第 69 期（2016 年 9 月），頁 149-182。

² 「天下型國家」一詞為渡邊信一郎所提倡使用的概念。請看下文。

³ 為了分析出在《荀子》和《呂氏春秋》的思想特色，本文基於觀念史／概念史的研究途徑。關於所謂「觀念史」研究途徑的內容，以及如何將之有效地引進於中國哲學研究領域之相關議題，請參見佐藤將之：〈日本學者追求「觀念史」研究的固有歷史脈絡與三個契機〉，《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1 期（2016 年 12 月），頁 3-21。不可諱言，「並非單一國家的富強本身」沒有意謂《荀》、《呂》兩書否定某一個國家的富強。

⁴ 《荀子》禮治論的淵源、構造以及其思想的特色，請參閱佐藤將之：《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佐藤將之：《參於天地之治：荀子禮治政治思想之起源與構造》（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

他認為秦君也充分有資格在近未來能提升為「天下之君」的可能性。以及第三、《呂氏春秋》的論述則在公元前 256 年開始的「無天子」世局為背景，《呂氏春秋》所界定的「天子」則暗示秦主。因此，其論述主要鼓勵「天子」以「養身」、「求賢」、「至公」等較為「消極的」方式來獲得天下人民的擁戴。

總之，在《荀子》和《呂氏春秋》中有關「天下」概念展開的論述，異於過去相關研究所稱呼為「天下觀」指出的，以外圍方向、統治規模以及服從型態等主要只由地理概念來構成的靜態之敘述；而是其本身含有多層的和豐富的預見、分析以及主張的政治哲學。

一、過去學者對中國「天下觀」研究的貢獻和限制

本節將整理過去所謂「天下觀」研究所提出的相關研究之主要脈絡和重要學者的觀點。⁵在此，筆者也欲提出過去研究中國古代「天下觀」相關議題時的一些問題，以期作為下節以後探討的出發點。

不可諱言，所謂「中國天下觀」這個議題在過去將近一百年期間不斷地吸引不少學者。雖然目前學界對此題目的興趣並不大，但相關研究成果已累積到了某種數量。據筆者所悉，在近代學術脈絡中所謂「中國天下觀」研究的開始在 1920 年代。在此大略一百年的研究史中，我們可以觀察其研究主題經過兩波的高潮。首先，將「中國天下觀」這個題目放在重要研究主題的是田崎仁義的研究。田崎在 1926 年出版的《王道天下之研究——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及制度》中探討與「中國天下觀」相關問題。⁶之後在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平岡武夫和山田統兩位也出版了相當仔細的論考。⁷而到了 1950 年代，由安部健夫藉由綜合考古資料、經書和諸子相關著作的相關內容，並且經過比較嚴格的統計手法和思想史方法，特別藉以仔細分析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時期文獻中的「天下」和「四方」等相關詞彙的用例來論述了中國「天下觀」的起源。在安部的研究將「中國天下觀」的研

⁵ 在這裡所稱「天下觀研究」者，主要包含（1）「中國傳統天下觀」和（2）「中國政治思想視野下的世界觀」兩個主題相關的研究。

⁶ 田崎仁義：《王道天下之研究——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及制度》（東京：內外出版，1926 年）。

⁷ 平岡武夫：《經書の成立》（東京：全國書房，1946 年）。山田統：〈天下という觀念と國家の形成〉，收於增田四郎編：《共同研究古代國家》（東京：啟示社，1949 年），頁 86-181，後收於山田統：《山田統著作集》（東京：明治書院，1981 年），卷 1，頁 1-81。

究水平提升了一層這樣的意涵來說，從當今回顧的立場來看，安部的研究為「中國天下觀」研究帶來了第一波高點。⁸

根據安部的研究，傳統經學對古代天下觀的理解恐怕只不過是兩漢以來的經學家所回想古代理想而「想像出」的虛構；並沒有基於實際歷史根據來證實。安部指出，若根據甲骨文和金文的考古資料，並沒有「天下」一詞的用例，而與其相當的意思則由「四方」一詞來表達。與此可對照，到了戰國諸子的文獻，「天下」一詞的用例則有所增多。根據在文獻之間「天下」一詞出現的頻率和內容的比較，安部結論說，後來經學家所理解的所謂「天下」一詞的意涵實為由戰國墨家的活動與思想來界定。⁹

稍晚於安部，而與他為不同的研究脈絡的顧頡剛、于省吾以及海野一隆，也個別發表他們對中國古代世界觀的研究。¹⁰顧頡剛對先秦時代「畿服」的分析中，比較重視安部幾乎沒列舉的《國語》中〈周語〉的相關用例，並與《左傳》的用例加以比較。¹¹海野一隆則主要按照比較文明研究的觀點試圖釐清中國古代人的「由圓型的天空、四方形的陸地以及圍繞著它的海洋」世界觀的特點。¹²不過海野的興趣只在於地理上的世界觀，因此他並沒有考察「天下」、「四海」等概念所包含的政治意涵。

在 1970-2000 的三十年中，在如上所列舉的諸家研究之基礎上，由於西嶋定生、刑義田、高明士、王柯、關口順等的研究，相關議題的研究有進一步展開，¹³

⁸ 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觀——政治思想史の試論》（京都：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1956年），後收入於氏著：《元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年），頁 425-526。後文引用皆以前者為主。並以《中國人の天下觀》簡稱之。

⁹ 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觀》，頁 462-679。

¹⁰ 顧頡剛：〈畿服〉，《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 1-19。于省吾：〈釋中國〉，《中華學術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 1-10。

¹¹ 顧頡剛：〈畿服〉，頁 2-3。

¹² 海野一隆：〈古代中國人の地理的世界觀〉，《東方宗教》第 42 號（1973 年 10 月），頁 35-51。

¹³ 西嶋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岩波講座世界歷史》（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卷 4，頁 217-256。後收於氏著：《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第 1 卷，頁 3-44。刑義田：〈天下一家：中國人の天下觀〉，《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恆的巨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頁 3-41。高明士：〈從天下秩序看中國古代的中韓關係〉，《中韓關係史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年），頁 1-33。王柯：〈三重の天下——中國多民族國家思想の起源〉，神戸大學《近代》1997 年第 82 號，頁 191-217。

在如上所列諸家研究的基礎上，在 2003 年渡邊信一郎以《中國古代王權與天下秩序》為書名出版其專書。該書將如上諸家研究的主要見解分成兩派，並且努力綜合兩種見解之間的共通點。在渡邊的研究中，值得提出的一點是，渡邊由「天下型國家」這樣的術語來試圖界定歷代傳統中國王朝天下觀的特點。¹⁴具體而言，渡邊主張，在王莽篡位之後歷代王朝的世界觀能夠以「天下型國家」一詞來理解各代王朝在認知周邊世界以及對外關係之際的意識形態。¹⁵渡邊主要以唐朝的國家意識形態為例，¹⁶主張所謂中國傳統王朝在意識形態上保持過對周邊異族的包容性。由於渡邊所探討的文獻範圍幾乎涵蓋從古代到近代的廣大範圍，他同時參考過在他之前發表過幾乎全部有關「天下」觀的研究著作，到當時在此主題的相關著作中成為最具備綜合特色的研究成果。也許由這個原因，按照筆者所悉，在由日本學者對中國「天下觀」主題的相關著作中，唯渡邊的該書有翻譯成中文來出版，因而渡邊的見解也比較廣泛地被介紹於中文學界。¹⁷

中文學界對「中國天下觀」研究迎接其「極點」的時期就是與渡邊信一郎出版該書同時期的 2000-2005 年前後。根據筆者所悉，黃麗生、¹⁸趙汀陽、¹⁹甘懷真、²⁰何新華²¹等學者針對中國「世界觀」的歷史和當代意義之問題陸續發表了文章。

關口順：〈天下觀念の成立とその思想的意義〉，《埼玉大學紀要：教育學部》1999 年第 35 期第 1 號，頁 21-39。

¹⁴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點から》（東京：校倉書房，2003 年）。後文以《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簡稱。

¹⁵ 渡邊針對「天下型國家」概念的提出和說明，請參閱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頁 68-70。

¹⁶ 同前註，頁 33-67。

¹⁷ 請參考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只是該書中文翻譯版直到 2008 年才出版。因此應該更正確的說，在 2000 年左右迎接高潮的中文學界「中國天下觀」的研究必然也關注渡邊的相關成果。

¹⁸ 黃麗生：〈儒家「天下」思想的內涵及其當代意義〉，收入黃俊傑編：《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一）》（臺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 年），頁 1-17。

¹⁹ 在大陸學界則有趙汀陽：〈天下體系：帝國與世界制度〉，《沒有世界觀的世界》（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5-54。不過，趙汀陽的興趣主要在於與中國和西方對國家和世界觀的比較下理解中國世界觀的特色。

²⁰ 甘懷真：〈「天下」觀念的再檢討〉，收入吳展良主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頁 85-110。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一書的中國古代的禮制和禮觀的問題也會涉及當時天下觀的問

另外，如上所提及的〈三重の天下——中國多民族國家思想の起源〉一文的作者王柯也出版了收錄該文中文翻譯的專書。²²此書關注歷史上中國為何能維持包含「多民族」的單一國家。而到了 2017 年王柯將此本的增訂版在臺灣出版。²³

在當時臺灣學界與國際學術交流氣氛相當活潑的研究環境脈絡下，²⁴吳展良則主持中國天下觀相關議題的研究計畫和學術研討會，並編輯了以《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為書名之論文集。雖然正如其書名，該論文集所蒐集的論文之範圍從古代中國到近代整個東亞國家，而且其主要探討對象是近世期（中國的明代之後）的世界觀相關的問題，但該論文集也包括探討中國古代世界觀相關問題頗值得參考的三篇文章。²⁵簡言之，對「中國天下觀」的研究發展而言，在二十一世紀開始的前後十年，以渡邊信一郎的專著為中心，可以說構成了「中國天下觀」研究的第二高峰期。

然而，在 2005 年～2007 年左右學界迎接了「中國天下觀」研究的「頂點」之後，學界對此主題的興趣逐漸降低，目前學者們對此主題的興趣似乎不像過往那

題。

²¹ 何新華：〈「天下觀」：一種建構世界秩序的區域性經驗〉，《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 32 期（2004 年 11 月），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409072.pdf>。

²² 王柯：《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²³ 王柯：《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7 年）。此本的簡體字版也最近有出版。請參閱王柯：《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

²⁴ 關於美國學界的中國世界觀研究，美國的 John Fairbank、Joseph Levenson、Benjamin Schwartz 等學者也對中國世界觀的問題發表了他們的研究。不過其主要關切在於中國近當代化的相關問題。對包含中國古代思想中世界觀問題則有 William Mote（牟復禮）的著作，在出版以來將近半世紀一直保持著相當大的影響力。請參閱：Frederick W. Mote, "The Beginnings of a Chinese World View," in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28。概述也有中文翻譯。請參見牟復禮著，王立剛譯：《中國思想之淵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²⁵ 有關中國古代世界觀的論文，除如上所列的甘懷真〈「天下」觀念的再檢討〉一文之外，還包含宋榮培：〈東方的「相關性思維模式」和對有機體生命的理解——以莊子和中醫的有機體生命原理為中心〉，吳展良主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頁 1-34。以及鄭吉雄：〈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吳展良主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頁 35-84。

麼高。據筆者所悉，與本文的主題比較息息相關的，就以中國古代的「世界觀」相關議題而言，近年關注此議題而發表複數文章之學者只有張其賢。張其賢的論考以「天下」、「族群」、「中國」等術語為切入點探討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特點。²⁶除此之外，游逸飛則在針對渡邊信一郎專書之書評中，也提出他對戰國時代「天下觀」的看法。²⁷

那麼，如上所列舉的「中國天下觀」相關研究中的見解將有何種啟示提供給本文的探討？若以闡明先秦時期「天下觀」之思想特色的話，過去的「天下觀」研究途徑是否有一些侷限和問題？先看過去「中國天下觀」相關研究之貢獻面。過去的相關研究主要闡明了如下兩點：第一、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產生的國家存在型態以及國家意識形態的特點，尤其是與西方國家的比較上，此途徑釐清了歷代王朝對於領土（各代王朝對邊疆下定的「定義」）和人民的構成（各代王朝要包含何種文明程度的「夷狄」）之看法，以及國家信仰（譬如「祭天」等）和意識型態淵源（如所謂「五經」等文獻和「仁義」、「忠孝」等德目）的內容。第二、此途徑確實釐清了戰國時代相關文獻中所觀察到的「天下觀」往後成為支撐超乎特定領土概念的所謂「大一統」國家意識形態的基礎。具體而言，安部健夫在《墨子》的思想中觀察到「天——天子／諸侯——人民」的統治架構之建立。平勢隆郎也指出，到了戰國時代，看世界的方向從「地上看天上」轉換為「從天上看下地面」²⁸另外，鄒（驪）衍所謂「大九州」論和「五德轉移」的學說也對秦漢時期「天下觀」的發展應該具有一定的影響。渡邊信一郎將戰國秦漢時期的「天下觀」界定為「天下型國家」的「意識形態」之形成時期。²⁹

儘管「中國天下觀」研究的如上相關成果無疑對本文的探討將有一些幫助，

²⁶ 在此只列舉與本書的議題比較相關的兩篇論考：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初探〉，《東吳政治學報》第 27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169-256；張其賢：〈戰國時期族群思想初探〉，《臺灣政治學刊》第 21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頁 1-56。張其賢比較關注在春秋、戰國時期並不屬於華夏人民的「族群」之存在。相形之下，本書則注意《荀》、《呂》兩書所強調認為人類之間的共通性（即，汎「人」基本上都屬於「人類」的想法）。

²⁷ 游逸飛：〈評《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點から》〉，《新史學》第 22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245-254。

²⁸ 平勢隆郎：《世界の歴史 2 中華文明の誕生》（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年），頁 38-39。

²⁹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頁 68-69。不過他同時也認為其完成的契機是在王莽以「定有天下之號」（《漢書·王莽傳》）的修辭來描述建立自己的王朝之意義的時候。請參閱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頁 10-12。

然而需要指出，筆者的問題意識和探討方式基本上並不屬於如上所述的所謂「中國天下觀」研究的脈絡。換言之，藉用「中國天下觀」的方式來進行的論考仍然無法直接回答本文所提出的問題。具體而言，筆者觀察到如下三點限制：

第一、在進行「中國天下觀」研究的大部分學者之興趣在於近世時期以後的天下觀，並且許多論者的研究出發點是從要理解「中國的國家觀、世界觀或民族觀，如何或者為什麼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的提問出發。³⁰ 因此，學者要找出的原因通常是在整體傳統中國王朝的國家和意識型態的歷史中超過個別王朝的特色。而在這些論考中，特別屬於其論述最初部分的戰國時代「天下觀」的論述，則往往只發揮整體「中國天下觀」形成中的「淵源性」角色而已。到此，不妨再談渡邊信一郎的「天下型國家」的理解框架。渡邊藉此術語來討論的時代是王莽政權之後。³¹

第二、學者在探討「中國天下觀」問題時，其主要關鍵詞引述範圍通常限自《尚書》的〈禹貢〉、〈洪範〉，以及《禮記》、《周禮》等所謂「經書」中的相關文段。換言之，過去學者們感興趣的術語限為要討論統治天下者與統治對象的互動方式的時候所使用的「四方」、「五服」、「九服」；討論統治範圍的時候所使用的「三千里」、「五千里」、「萬里」等詞語。問題是，學者在引述相關用例的過程中往往認為，因為這些術語在經書中出現，它們應該從戰國時代以前早已存在。譬如，田崎仁義和平岡武夫只靠對所謂經書，如《尚書》的用例之分析就主張「有德」的「王者」能治理「天下人民」的「天下觀」是在周初時期就已經存在的。³² 顧頡剛則認為《周禮》是戰國時期的作品。然而，雖然《周禮》的主要內容代表什麼時代是個複雜的思想史問題，但很清楚的一點是，《周禮》所描述的「天下」之地理規模的龐大程度，應該遠超乎戰國時代人所實際界定的範圍。因此，若顧頡剛的揣測屬實，《荀子》和《呂氏春秋》中天下國家制度的

³⁰ 譬如，其問題意識在安部健夫和王柯的研究中典型地觀察出，請參見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觀》，頁 425-628、524-525。王柯：《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頁 1-6。

³¹ 除此之外，渡邊在使用「天下型國家」一詞時，將其國家的周邊人群以「異族」的概念來區分，並且渡邊比較關切其理念的包容性。筆者則認為《荀子》和《呂氏春秋》的「天下型國家」的成員的基本特色就是屬於彼此一樣的「人類」。關於這點，請參閱佐藤將之：《〈呂氏春秋〉和《荀子》對「人類國家」構想之探析：以其「人」觀與「群」論為切入點》，頁 149-182。

³² 田崎仁義：《王道天下之研究》，頁 13。以及平岡武夫：《經書の成立》，頁 232-234。

相關記載必然被視為《周禮》「天下觀」的退縮。本書並不否定《周禮》包含許多戰國時代的人所留下的資料，但並不採取以《周禮》的內容來代表戰國時代的「天下觀」之預設。³³

第三、這一點是與在第二點所提出的問題相關的。當代學者通常在論及戰國秦漢之際的「天下觀」之推移問題時，通常從如上所列舉的「經書」談起，而討論到《論語》、《孟子》、《禮記》〈王制〉、《尚書》〈禹貢〉中相關記載的分析。但令人費解的是，學者們的探討並沒有包含著對「天下」一詞含有這麼豐富的用例之戰國諸子的文獻，而從經書的用例直接跳到《史記》〈秦本紀〉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時期設置郡縣的相關論述。雖然筆者同意從《尚書》到《論語》等所謂「經書」（包含朱熹所界定的「四書」範疇中的「經書」在內）中的用例之重要，但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在整段戰國到秦漢時期，戰國諸子相關文獻的思想影響力並沒有比如上所舉的「經書」小。簡言之，大部分的過去相關研究在探討所謂「中國傳統世界觀」的探討中並沒有充分活用到戰國諸子文獻的相關用例。依筆者所觀察，少數例外是安部健夫和高明士的論考。高明士為了闡述先秦時期天下觀的原理時，雖然他探討的主要對象是，與其他幾位學者一樣，以《尚書》〈洪範〉、《論語》、《禮記》為中心，但他還論及《韓非子》的用例。

在此問題意識的脈絡上，唯安部健夫的研究明確指出在中國傳統的「天下觀」的形成過程中戰國諸子思想的關鍵性角色。如上所述，安部特別重視《墨子》（尤其是「十論」）作者們藉由反覆使用「天下」一詞來探求當時政治、社會秩序以

³³ 關於這一點，也許有些學者認為《禮記·王制》中的相關論述保留比較多戰國時期的思想成分。不過，假設我們仔細看其中論及天下秩序的相關文句，便能發現不少在《荀子》和《呂氏春秋》天下觀中完全沒有的主張，例如（1）將「士」分成「上士」、「中士」、「下士」三等級；（2）正如「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的句子般，將「國」視為構成更大的行政單位；（3）正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句子所表示，強調諸侯國最高官位的人需要由「中央政府」來派遣等等。這些在《禮記·王制》的「構想」內容似乎呈現著其編作者意識到漢代的天下秩序和政治情況的事實。再說，雖然這些情形並不會否定在〈王制〉所列舉的許多規定內容應該淵源於戰國時代的文獻記載。但若我們關注其作者對整體天下秩序的觀點的話，我們可以推測：其作者可能根據《荀子》和《呂氏春秋》天下觀的論述架構，在考慮秦漢國家治理天下的當時情況下，探索更為理想來治理「天下型國家」的藍圖。職是之故，本文暫將《禮記·王制》的文獻性格基本上歸類於比較接近於《周禮》。參考〔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四部備要·經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卷4，頁2-4。

及和諧的重建。³⁴在此意義上，戰國時期的墨家就是「天下」概念的「創出者」（安部語）。不過，安部同時指出，將墨家所創出的「天下」概念而要達成「戰國狀態」的終止則稱為「大一統」（安部語）。³⁵在此條推論理路，雖然安部也列舉其他戰國諸子使用「天下」一詞的統計數字，只不過這僅僅是為了強調此數字是在戰國諸子文獻中《墨子》最多使用「天下」一詞這一點而已。然而，從筆者的觀察，安部的論述之理路上的問題是，安部只重視墨家使用「天下」一詞構想了未來「一統天下」這一點。那麼，其他諸子完全沒有以「天下」一詞思考這個問題嗎？關於這一點，令人費解的是，一看就顯著地可以發現，以「天下」一詞構想所謂「大一統」的傾向在《荀子》和《呂氏春秋》中更為甚，而安部卻完全不提兩書中的「天下」一詞的特色。

其實，很諷刺地，如上筆者所提出的幾點批評，並不意味著學者們對《荀》、《呂》兩書也含有與「天下觀」相關的論述不熟。譬如，《荀子》〈正論〉中探討「王者之制」和「楚越受（王）制」³⁶的一段，也在此論及「五服」的問題。同樣的情形也可見於《呂氏春秋》的〈有始〉有「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³⁷以及〈慎勢〉的「凡冠帶之國方三千里」（〈慎勢〉，卷 17，

³⁴ 更正確一點，安部發現在整部《墨子》中，「天下」一詞頻出的部分是其前面三十三篇，即所謂「第一類」和「第二類」（按：所謂「墨子十論」屬「第二類」）。安部強調在此部分就有五百個以上的用例出現的事實。請參見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觀》，頁 449-451。不過，安部除了不太重視「天下」一詞在其他戰國諸子文獻中也大量出現的事實，也沒有特別注意按照其與總字數比例（在一萬個字中所出現的頻率）來說，現本《老子》的頻度（108 次）比《墨子》（65 次）還多的事實。筆者認為在《老子》的相關用例中，我們可以觀察出，與《墨子》一樣能代表戰國時代早中期「天下」觀展開的重要特色。但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釐清到過去幾乎完全忽略的《荀》、《呂》兩書的「天下觀」的內容和思想意義，請容筆者另專論《孟子》、《老子》等其他戰國文獻中的「天下觀」。

³⁵ 同前註，頁 479。

³⁶ 本文所引用古籍資料，參考由 Donald Sturgeon(德龍)主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hinese Text Project) 網站，2020 年 8 月 30 日，網址：<https://ctext.org/zh> (2020 年 8 月 30 日)。檢閱實體書，參考〔戰國〕荀況：〈正論〉，《荀子》，《四部備要·子部》（臺北：台灣中華書局，1996 年），卷 12，頁 5。引用《荀子》資料龐大，避免繁冗，所引資料於文後只註明篇章卷數及頁碼，不再標註出版資訊。

³⁷ 〔戰國〕呂不韋：〈有始〉，《呂氏春秋》，《四部備要·子部》（臺北：台灣中華書局，1979 年），卷 13，頁 3。引用《呂氏春秋》資料龐大，避免繁冗，在行文後附上篇章卷數及頁碼，不再另立註腳。

頁 13) 的論述中。過去的研究不可能不知悉《荀》、《呂》兩書中含有如上用例之事實。不過在過去研究的脈絡中，這些記載只被看作在戰國時期存在的有關天下範圍問題的多種觀點中之多分枝出 (variant) 的小例子而已；並沒有進一步去思考在戰國末年的世局下《荀》、《呂》兩書實為藉以「天下」一詞來構想過近未來一統天下國家之重要性。再提高明士的研究，其實他在該篇中也論及中國古代天下觀中「禮」角色的問題，但整篇中從頭到尾並沒有出現對《荀子》的引述。³⁸ 同樣地，因為過去大部分學者的理路上無法想像《荀》、《呂》兩書的相關記載可能直接影響及秦漢時期「天下觀」的可能性，並沒有再花力氣去探討《荀子》和《呂氏春秋》的「天下觀」。既然《荀子》和《呂氏春秋》思想的目標在於提出以天下規模的單一政治共同體（「天下型國家」）的構想這一點，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是，在如此兩書勾勒出具體一統的天下秩序之藍圖中所出現的「天下觀」才應該可能對後世此觀念的展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總而言之，過去大部分「中國天下觀」相關議題的研究是從對「中國近代國家觀」的形成和特質的興趣所出發的。雖然其中幾位學者在探討中國「天下觀」的淵源問題上也論及戰國時期的「天下」概念之內容和意義，但對《荀》、《呂》兩書「天下觀」的論述迄今甚少。可能的原因是學者在過度重視「經書」中的用法之餘，將《荀》、《呂》兩書中的「天下觀」最多僅僅看作戰國諸子「天下觀」的分枝而已。與此對照，下節以下的探討則專門關注《荀》、《呂》兩書中所出現的「天下」概念。而且筆者欲論證此兩書以「天下」概念來建構的論述構想了近未來能夠治理「天下」的一種「世界國家」，這樣的「天下觀」比它們之前其他戰國文獻中的「天下觀」應該更具備系統性和理論性。因此，在所謂「秦漢國家」所繼承的「天下觀」也應該就是此兩書以某種程度已系統化和理論化的「天下觀」。換言之，即便在《尚書》、《國語》或《墨子》等相關論述中，可以找到漢朝「天下觀」的思想雛形或原型，這樣先秦時期的各種「天下觀」，應該是由於經過《荀》、《呂》兩書中理論化的過程，「天下觀」才提升為實際上治理在歷史上未曾經驗過的廣闊領土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

³⁸ 高明士：〈從天下秩序看中國古代的中韓關係〉，頁 1-17。

二、《荀子》的「天下」概念

下面，我們將對在《荀子》一書中所出現的「天下」概念之用例進行探討。我們在探討《荀子》中的相關用例之前，無妨先概觀先秦諸子文獻使用「天下」一詞的情況。根據筆者的觀察，大抵而言，在先秦諸子文獻的用例中「天下」一詞含有三種涵義。³⁹在第一種涵義中，「天下」一詞是個係指物理空間的概念。在此「天下」係指華夏文明所涵蓋的地理範圍。第二種涵義則在戰國諸子所回顧的歷史形象中常出現。在此，實際上也好，理念上也好，「天下」概念係指從神農或黃帝以來的最高統治者曾經統治過的領土空間。第三種涵義則是在戰國時期的相關著作中，戰國諸子在論及當時的情況時常出現的。在此，戰國諸子藉以「天下」一詞敘述由具「天子」這個名稱的統治者所治理的領域。⁴⁰關於此第三種涵義還有值得注意的兩點：（1）在戰國諸子的論述中此意義的「天下」概念出現時，其強調點並不在於「天子」所統治的領域，而是被統治的人民。（2）在這裡「天下」也會係指未來的「天下」，因而在此「天子」一詞也便係指未來（理想的）治理整體華夏文明的統治者。由於過去的相關研究比較忽略戰國時期「天下」概念此第三種意涵的此兩項特色，許多研究只好留在探討相關文獻中的地理層次的涵義，故而無法呈現出中國古代「天下」概念所含有的多層性和動態性涵義。職是之故，在我們分析《荀子》和《呂氏春秋》的「天下」概念時，我們將比較關注此兩書的「天下」概念常常含有其所主張的未來理想世界統治者之志向或意涵這一點。⁴¹

³⁹ 其實，在先秦諸子文獻的用例中所出現的「四海之內」一詞也大抵上含有與如上「天下」概念的三種涵義。

⁴⁰ 更正確地說，此「天下」係指「天」統治的領域（和人民）。在此模式中，其實「天子」只不過「天」的代理人而已。此種「天」支配整塊地上意涵的「天下觀」直到戰國中期前的論述仍相當濃厚。關於戰國時期的「天下」觀，尤其在《墨子》思想中「天」概念的角色之詳細探討，請參見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觀》，頁 469-479。也可以參考王柯對「天」和「天下」之間密切關係的闡述。參見王柯：〈三重の天下——中國多民族國家思想の起源〉，頁 194-196。與戰國中期前的情形相比，如在《荀子》和《呂氏春秋》等戰國末年的文獻中，「天下」概念中「天」的意涵轉換成屬象徵性的。在此意涵，假設某一個人當了「天子」，這可能並非是「天」真正任命了他為天子；而是他藉由祭拜「天」，而使「天下之人」都相信「天」任命了他為「天子」。

⁴¹ 王柯根據他對《尚書·禹貢》的解讀而指出：在〈禹貢〉作者的世界觀中，禹曾治理過的領

基於如上對戰國諸子文獻中的「天下」概念之涵義的理解上，下面則進入《荀子》「天下」概念的分析。在現本《荀子》一書中，「天下」一詞共出現 373 次，在先秦秦漢的文獻中其用例的總數量居在第三多。⁴²那麼，為了呈現《荀子》「天下」概念的思想特質，本節的探討將分成兩個部分：（一）探討《荀子》中出現的「天下」一詞之用法上特色。（二）闡述荀子藉由使用「天下」一詞來描述的統治者、以及由他治理的國家、社會或「世界」的特質。根據如上問題的探討，在下節也將對於《呂氏春秋》「天下」概念的探析，本文最後也將探析在《荀子》的「天下」論視野下的秦國或秦君，治理「天下」之君王的資格是否足夠的問題。⁴³

（一）《荀子》「天下」一詞用法上的特色

那麼，根據如上所述在戰國諸子文獻中「天下」一詞用例的一般情況之理解，我們將進入《荀子》中用例之分析。首先，《荀子》「天下」一詞的用法也可以分為地理意涵比較濃厚的用例和人的意涵比較濃厚的用例。其實，從數量上看，前者的用例並不多。我們能觀察的是「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大略〉，卷 19，頁 1。）、「遠者天下，近者境內」（〈君道〉，卷 8，頁 7）等少數用例。另外，若還包含在「天下之～」語法的中呈現此意涵的話，也有如「國者，天下之大器也」（〈王霸〉，卷 7，頁 4）等例子。

接著，我們來探討在《荀子》「天下」一詞時會發現：其壓到性數量的用例其實同時含有「天下之人」的意涵，而按筆者的觀察，將此種「天下」概念的涵義大概可由如下五種用法來分類：（1）身為意志或行為主體的「天下之人」；（2）通於人類世界的法則；（3）回顧古代聖王治理過的領域；（4）在不久未來為了

域「天下」就等於「四海之內」。請參見王柯：〈三重の天下——中國多民族國家思想の起源〉，頁 193-194。在本文對「天下／四海之內」概念的視野下，我們也要注意的，〈禹貢〉的作者藉以描述禹曾治理過的「天下」領域來實為要呈現未來理想的統治者所能治理的領土和人民之範圍。

⁴² 「天下」一詞出現最多的先秦文獻是《墨子》的 526 次；第二多的則是《管子》的 466 次。關於《荀子》和《墨子》的「天下」概念的比較，請看下文。

⁴³ 荀子的一生（約 316-235 B.C.前後）中，秦國經過四位君主：昭襄王（325-251 B.C.）、孝文王（302-250 B.C.）、莊襄王（281-247 B.C.）以及嬴政（秦始皇，259-210 B.C.）。其中荀子與昭襄王進行問答。請看〔戰國〕荀況：〈儒效〉，《荀子》，《四部備要·子部》，卷 4，頁 3。關於具體的探討，請看下文。

能當全人類的君主的條件；以及（5）由理想的君王所治理世界之描述。在《荀子》中此五種「天下」的涵義在具體上以個別如下的用例和情況中出現。

（1）身為意志或行為主體的「天下之人」：「天下」成為行為主體的主語，而從文脈來說明顯係指「天下之人」，如「天下不能蕩」（〈勸學〉，卷1，頁7）、「天下從而治……則天下從而亂」（〈榮辱〉，卷2，頁12）、「天下應之如雷霆」（〈儒效〉，卷4，頁6）、「天下脅於暴國」（〈王制〉，卷5，頁11）、「天下願」（同上註，頁2）「天下歸之」（〈王霸〉，卷7，頁13）、「天下皆寧」（〈樂論〉，卷14，頁3）等。這些用例中的「天下」一詞都實為係「天下之人」，而在大部分的用例中，荀子探討「天下全部的人」對某一位統治者是否願意服從的情況或條件之問題。此意涵的「天下」也成為賓語，並且其用法也很多樣。「天下」直接成為賓語的有，如「以示之天下」（〈仲尼〉，卷3，頁15）、「兼利天下」（〈王制〉，卷5，頁8）等。在賓語句中成為主語的有「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同上註，頁11）。在「天下～」的用法中成為「～什麼」的主語的有，如「彼固天下之大慮」（〈榮辱〉，卷2，頁13）、「是天下之所棄」（〈非十二子〉，卷3，頁11）等。其實，此種用法並不一定是在《荀子》中最有特色的用法。⁴⁴

（2）通於人類世界的法則：荀子在主張某種法則「通於整體人間世界或人類社會」的必要時，「天下」一詞也常出現。此用例也相當多，如：「總天下之要……盡天下之方」（〈不苟〉，卷2，頁5）、「天下之大事」（〈非相〉，卷3，頁6）、「天下之大節……天下之大知……天下之大決」（〈仲尼〉，卷3，頁14）、「天下之行術」（同上註，頁17）、「天下之通義」（同上註）、「天下之道」（〈儒效〉，卷4，頁7）、「天下之本」（〈富國〉，卷6，頁4）、「天下之公患」（同上註，頁6）、「國者，天下之制」（〈王霸〉，卷7，頁1）、「天下之大道」（〈君道〉，卷8，頁7）、「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王霸〉，卷7，頁13）、⁴⁵「天下之大齊」（〈樂論〉，卷14，頁2）、「凡古今天

⁴⁴ 在《孟子》中也有豐富的用例，在這裡僅舉如下〈梁惠王下〉兩個用例：〈梁惠王下〉的「天下信之」、「天下固畏齊之疆也」。這些用例中「天下」實為係「天下之人」之意。〔戰國〕孟軻：〈梁惠王下〉，《孟子》，《四部備要·經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卷2下，頁5。後文引用《孟子》避免繁冗，引用資料於文後註明篇章及頁碼，不再另立註腳。

⁴⁵ 一般而言，此用例被看作來自墨家。在現本《墨子》中「天下之利」和「天下之害」的例子甚多（前者有21例；後者則22例）。

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性惡〉，卷 17，頁 4）、「天下法式表儀」（〈堯問〉，卷 20，頁 18）。在這裡位在「天下～」以下的詞語是表示一種法則，但在此全部的用例基本上都還含有「人類普遍會接受或需要遵守的（法則）」之意涵。

（3）回顧古代聖王的治理：荀子在描述過去聖王治理過的世界，或取得中原世界的統治者之敘述中常使用「天下」。其實，在此使用的情況按照歷史演變分成三種。第一種為在描述太古堯舜時候所出現的「天下」，如：「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王制〉，卷 5，頁 11）。第二種則是主要描述商湯王和周武王打倒前朝的攻伐事實時所使用「天下」，例如：「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榮辱〉，卷 2，頁 12）。第三種則是周公，荀子重視在周朝開始治理天下時周公所發揮的正面角色，譬如「以正吾（按「周公」）身，以定天下」（〈堯問〉，卷 20，頁 17）。特別在〈儒效〉開頭的「大儒之效」之一段論述中，荀子為了大力提倡周公奠定周朝繼續的功勞，在整段使用多達 19 次的「天下」。在如上三種用法中，構成《荀子》「天下」觀的思想特色者就是第二和第三種用法。關於這一點，我們到下文詳論。

（4）不久未來為了能當全人類的君主的條件：荀子所構想的理想的君王在不久未來將一統人類世界的行為或過程本身。乍看之下，這些君主要做什麼的實際內容往往與（3）的主張似乎並沒有差別。其實，（3）和（4）都在荀子的構想中提出來的意涵上，其主張內容本身可以說是一樣的。而主要差別應該存在於：在（3）的用例中，治理「天下」的條件是與古代的聖王聯想在一起，⁴⁶而在這裡的理想統治則基本上為荀子自己的主張，或由荀子直接提倡的德目和幾項政策而達成的境界。在這裡，通常以「如果一國的君王達成荀子所提出的條件，他就可以取天下」這樣的句子來出現，而且其用例在數量上也相當豐富。⁴⁷於此相關出現比較多的用例是荀子主張：原來治理「百里」的國家，只要實踐荀子所提倡的政策，

⁴⁶ 在此，與古代聖王被聯想這一事並非意味著他們古代聖王們實際實踐過；而這些不如看作荀子相信當今的統治者應該像古代聖王一樣實踐。

⁴⁷ 例如：「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引自〔戰國〕荀況：〈榮辱〉，《荀子》，《四部備要·子部》，卷 2，頁 9。「三者體此而天下服」，引自〈王制〉，卷 5，頁 12。「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引自〈富國〉，卷 6，頁 4。

最後將能成為治理「天下」的國家。⁴⁸例如：「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儒效〉，卷4，頁11）、「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於人主之知之也」（〈王霸〉，卷7，頁8）這一點也可以說是在《荀子》的「天下」概念中相當顯著的特色。在下文詳論。

依筆者來看，在整本《荀子》的「天下」用例中，此用例可以說最為豐富，而如上所列舉，此用例在〈王霸〉中最密集出現（後詳述）。

（5）由理想的君王所治理世界之描述：在《荀子》中有很多文段中闡述由理想的君王在人類世界達成的治理狀態。與（3）不同地，在此荀子沒有提及特定的人名。不過荀子使用許多的名稱——如「百王」、「後王」、「人主」、「君子」、「天子」、「天王」——闡述由他所界定的理想的君王來治理的理想世界。這些用例有，如：「百王之道，後王是也。……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若使一人。」（〈不苟〉，卷2，頁5）。⁴⁹

與（4）的描述可以值得比較的一點是，在（4）是「一個國君假設能實踐～，他就會取天下」的句子出現，而（5）的內容則是荀子預設某一個「天下之君」已經治理「天下」的狀態。因此在此用例中，我們並不清楚荀子在（5）中所提倡的「理想統治的情況」代表由於某一個國君原先實踐過，他能達成了一統呢？還是當今已經屬「天下之君」（周君？秦君？）的統治者所要實行的政策？換言之，在前者中荀子等於提出治理「天下」的條件；在後者則只是描述未來的理想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前者的主張可以代表荀子「天下」論中的一種動態性特點（百里之君→天下之君），但因為一個國家還屬於「百里之國」當時，在此國君的上面理論上一定有「天下之君」，所以此「百里之國」之國君只靠（譬如）他的「德行」能不能取代當時即存在的「天下之君」的地位這一點，會成為政治哲學上的爭點。其實，在荀子「天下」論中存在著這樣的思想張力可能代表著荀子提倡此兩種內容的「天下」觀已某種程度反映當時「周天子已不在」和「秦國獨強」的

⁴⁸ 荀子也使用以負面意義係指「取天下」的句子，如「竊天下」、「奪人天下」、「擅天下」，都在〈正論〉中出現。引自〔戰國〕荀況：〈正論〉，《荀子》，《四部備要·子部》，卷12，頁4、7。

⁴⁹ 關於對「天下之君」其他的稱呼的話，譬如：有「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引自〔戰國〕荀況：〈王制〉，《荀子》，《四部備要·子部》，卷5，頁11。「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引自〈王霸〉，卷7，頁7。「故天子不視而見」，引自〈君道〉，卷8，頁5。

戰國最後世局的情況。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到下節再考察。

（二）《荀子》「天下」概念的思想特色

以上針對在《荀子》一書中「天下」概念用法上的特色加以整理，而下面則試圖釐清荀子藉以使用「天下」概念所要提出何種主張，以及在此主張含有何種思想特色的問題。筆者欲將此主張內容和思想特色分為如下三種來探析：其一、荀子所主要探討的「國家」並非等於諸侯國規模的一國，而是「天下型」國家的構成和運作。其二、在荀子的「天下」觀視野下，每個國家具有興亡的動態。從正面的面向看，有一個「百里」之小國理論上能成長為「天下型」國家。其實，在「天下」觀背後，在某一個國君所達成的（荀子所提倡的）「倫理德目」和他所治理的「國家規模」之間具有一種「相關係數」般的關係。換言之，國家的規模必然按照其國君實踐倫理德目的程度變動。荀子認為每一個國家經過這樣動態，而其極終最大化為一統「天下」；而極終最少化則是其國家的滅亡。其三、對荀子來說一統「天下」的主體當然為國君。不過若我們用心分析有關「天下」的相關論述便可發現，荀子在說明周朝的建立和得以安定的歷史之際，除了周武王攻伐商紂王的故事之外，也提及周公的重要角色。

（1）其主要探討對象並非諸侯國規模的一國，而是「天下型」國家：首先要澄清，這裡所說的「荀子所主要探討的『國家』並非等於諸侯國規模的一國」並非意味著荀子沒有論述以「諸侯國」為基本單位的國家。不可諱言，在荀子的時代，實際存在的國家，甚至包括「周天子」所實際治理的領域都是諸侯國。因此，荀子在分析當時實際存在的統治者、國家制度、政策等問題時，所討論的材料都是從當時諸侯國的情況著想，並且荀子自己的對策方案所提供的對象也會是當時諸侯國的統治層人士。如此，在《荀子》的論述中在荀子活動當時的秦國、楚國、趙國等國家均成為荀子所要批評之對象。不過，如下所述，我們較為仔細觀察在《荀子》對現有的國君、國家制度以及其運作等問題談論時，即使荀子論述的開始是從秦國、趙國等具體事例談起，在話題進入荀子本人的建議時，也就是說荀子開始談未來理想的國家時，荀子所說理想的國家之人民、領土以及制度等構造都變成遠遠超越當時所存在的諸侯國之範圍，在荀子所意向的這樣「國家」之構造已不再是像當時所存在的諸侯國的型態：其「國家」便具備著「天下型」的構造和規模。在此論述中，在荀子構想中的理想統治者是個被稱呼為「聖王」、「後王」、「人師」等的「天下之君」。在這樣的荀子的論述中，發揮非常重要功能

的術語就是「天下」一詞。

眾所周知，在現本中的〈儒效〉以下〈王制〉、〈富國〉、〈王霸〉、〈君道〉、〈議兵〉等的篇章中荀子大力展開他對於當時的統治者、國家型態、政治社會制度以及其運作的問題之看法。不過，耐人尋味的情況是，若我們關注相關文段中荀子如何使用「天下」一詞的話，便能夠發現在這些篇章中荀子對理想國家的探討比較少提及在個別諸侯國的層次上進行；而荀子往往一口氣以涵蓋全「天下」的國家規模來進行其論述或對話。其實，在如上列舉的六篇中，因為荀子所稱上的「王」和「君」，除非他向秦王或趙王等對話稱呼對象的場合之外，基本上都係指「治理天下的君主」之意涵，所以我們比較容易看得出在〈王制〉、〈王霸〉、〈君道〉三篇中的國家論和君王論本來就會向「天下型」國家的方向展開。此部分理由是因為荀子所使用的「王」和「君」兩個字究竟意涵係「天下之君」。相形之下，〈儒效〉和〈富國〉兩篇中的論述則是從篇名中的「儒」、「國」等的用詞來得知，通常會讓我們聯想其內容主要關於儒者對治理諸侯國的正面角色和富強某一個諸侯國的方策等議題展開。但是假設仔細看此兩篇的全部內容，荀子在大部分的文段中不斷提出「天下型」國家的理想藍圖。

職是之故，下面我們將以〈富國〉的內容為例子，探討荀子在表面上對「一國」的論述由於「天下」概念的引進而展開有關「天下型」國家的論述的情形。據此理解，筆者期盼闡明荀子政治哲學中從「一國」層次到「天下型國家」層次展開的一種動態。從〈富國〉這個篇名來令人聯想的內容應該是如何將一個國家富強起來的問題相關，不過如同其他篇章一樣，即便其討論從當時諸侯國的實際情況開始，其中荀子對通觀「天下」問題的興趣和視角也不斷透露出來。

從論述的構成來看，整篇〈富國〉二十段左右的論述約可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人類社會的特質，並據此「分」論，也就是說「止爭」方法的提出。在此第一部分中從「足國之道」開始的第二段論述，是在整本《荀子》中比較罕見的從頭到尾只論述以諸侯國為主題來提倡荀子自己的想法的文段。⁵⁰ 從「墨子之言」第二部分則是對墨家非樂論的反駁。第三部分是從「垂事養民」一句開始的「養民」論，而其核心主張為「忠信」之德和對人民施「愛利」的實行。第四部分以「觀國」（有兩段）、「用國」、「持國」等關鍵詞的出現而可以理解荀子觀察當時諸侯國之實際情況的論述。

⁵⁰ 因此，「富國」的篇名似乎來自於其編者（可能是劉向）以這一段論述內容來代表整篇的主題。

再說，若我們仔細看每段的論述，在大部分論述的背後，我們能夠發現荀子對「天下」問題的強烈關懷。首先第一段的「人倫……同欲而異知」的問題會產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富國〉，卷 6，頁 1-2）的情況，而在此正如荀子使用「天下」一詞般，荀子所探討的是人類社會的普遍問題——在有欲的人之間如何建立分配資源的秩序。不可諱言，人類並非只住在特定的諸侯國。接著，在下一段「插」進「足國之道」的反墨論述預告之後，第一部分第三段以下全面展開「禮」論，而在此荀子不斷使用「天下之本」、「合天下而君之」、「兼制天下者」、「兼足天下之道」等句子的事實，就表示在第一部分的「人欲」論和「社會分工」論是針對建立理想的「天下型國家」之構想所提出的。因此，其中並沒有出現「天下」的第二段「足國」論也不必視為一定只論述諸侯國本身內部的問題。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荀子從「天下視野」論述問題也相當明顯。譬如，在這一段反墨論的「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同上註，頁 6）一句中，「天下」一詞便出現兩次。此開頭與該論述幾乎最後的「故儒術誠行，則天下人大而富」（同上註，頁 8）一句可對照，藉此荀子不但表示他堅信墨家的言論會讓「天下」陷於貧窮，而且也暗示，此篇的名稱上「富國」的究竟目標為「富天下」，因而「富天下」也許可以說是此篇的實際主題。同樣地，針對第四部分的論述，雖然這部分論述的前半論述中「天下」一詞並沒有出現，但在後半，由於我們確認荀子提出「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潢然兼覆之」（同上註，頁 9）等論點，而且在此部分的最後明確說「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矣」（同上註，頁 10），荀子具有「天下」視野這點是無疑的。

關於這一點，屬於第四部分的論述，由於該部分包含從「觀國」一句開始的兩段論述，而在最後剩下兩段中荀子個別使用「用國」（第三段）和「持國」（第四段），乍看之下，此部分的主題並非「天下」，而是「諸侯國」。不過仔細分析，我們便能夠發現在內容和論述結構上比較複雜的情形：在每一段的開頭，荀子從當今情況的分析開始論述，此內容應該代表荀子當時觀察諸侯國的實際情形。然而，荀子再進一步討論這些國家未來正面的發展方向之話題時，對「天下型國家」的構想就會凸顯出來。譬如說，在此部分開頭的論述中，荀子所分析的對象是「亂國」和「貪主」。但其文段的後面荀子開始闡述他自己所構想的「治國」時，荀子提出兩次「禮義節奏」。正如〈王制〉中「審節奏」的國家之「兵剽天下勁」（〈王制〉，卷 5，頁 11），結果正如達成「夫堯舜者一天下」一樣

的成果。換而言之，荀子將話題轉換成正面「治國」時，放在其念頭的國家為「天下型」的。同樣地，第三段「仁人之用國」的論述也提及此統治者達成「天下莫之能隱匿也」之效果。（〈富國〉，卷 6，頁 12）最後第四段的「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同上註，頁 13）的論述，按邏輯，既然要「事暴國」的國家應該是比此暴國弱的諸侯國，但在這裡的後面，荀子所提出的解決方法是如上第一段一樣的「修禮」和「節奏」，結果是此國家的「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其實，在荀子的觀點中，能夠指揮或驅使所有的強暴的國家的統治者就是屬於「（後）王」或「聖王」等級的人，因在這裡，荀子探討被欺負的國家之解決方策時，他的「天下型國家」（的統治者）視野還是呈現了出來。

總之，在〈富國〉整篇論述四個部分的内容中，從頭到尾以當時荀子所目睹的「諸侯國」規模來談國家治理的問題之一段只有在第一部分中「足國之道」的一段和第四部分第二段「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同上註，頁 11）的論述（此段的結論停止於「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之外，其他論述的大部分無論其明顯度與否，荀子都從「天下」視野探討一個國家如何建立健全的政治機制和社會秩序的問題之態度可以看見。

（2）「百里」之小國會能成長為「天下型」國家的動態：在上面的論述暗示，荀子評論某一個國家的制度和運作的問題是，其在背後似乎抱著理想「天下型」國家的一張藍圖。譬如說，以如上所述〈富國〉的「觀國」之論述為例，在「觀國」這一段的論述中荀子所要對比的對立架構是被「愚主」統治的某一個諸侯國和被「明主」統治的「天下」。因為在「明主」所治理的國家說明中荀子舉禹、湯的例子，荀子所描述的國家範圍涵蓋天下這一點是無疑的。若此段的論述只是「愚主」治理的諸侯國（現實狀況）和「明主」治理的天下（理想境界）之對照，在此兩者之間有個斷絕。換言之，此種「愚主」所治理的國家絕無法自然成為像「明主」所治理的「天下型國家」。反之，這些國家早晚會陷於滅亡的命運。因此，荀子在此對比的論述後在總結的前半一句說：「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同上註）其實，耐人尋味的是荀子接下來在總結的後半，也就是說「總結的總結」中說的一句話，荀子即說：「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同上註，頁 12）乍看之下，在此段的總結中荀子提及「百里」小國是否能夠生存的問題，令人感覺有點突兀。然而我們只要理解在荀子的「天下」觀視野下「百里」之小國是與治理「天下」的國家在時間軸上會連續的這一點，我們便能夠理解荀子在這一段

最後「加上」百里小國也能獨立生存的句子之理由在荀子的理路上有著倘若任何原本的小國由一位「明主」來治理的話，未來能成長為「天下型國家」之預設。在整本《荀子》中，「百里」的國家之君主最後能成為「天下型國家」的君主之用例大略有十條。其中較為代表性的例子是荀子提及商湯王和周武王一統天下的描述。此例有三則：

湯以亳，武王以鄩，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王霸〉，卷7，頁2）

故湯以亳，文王以鄩，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同上註，頁10）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議兵〉，卷10，頁14）。

在〈仲尼〉中其主角為自己還沒有討伐動作的周文王，即說：

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仲尼〉，卷3，頁15）

其實，就荀子而言，只要實踐荀子所提倡的政策，此國君無疑能成為「天下之君」。因此此「百里」在理論上為任何諸侯國都是可以的。〈王霸〉曰：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王霸〉，卷7，頁8）

其實，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仁人→十里→百里→千里→四海」句型的例子。〈議兵〉說：「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議兵〉，卷10，頁2-3）雖然此引文中並沒有「天下」一詞，但在文中「四海」可以與「天下」互換。⁵¹由於在此文段後還從《詩》引用「武王載發」的一句，此「仁人」無疑係指周武

⁵¹ 在《荀子》中係指「天下」意的「四海」的用例也相當豐富（將近20條）。譬如，在〈解蔽〉的「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中的「天下」和「四海」可以完全互換。〔戰國〕荀況：〈解蔽〉，《荀子》，《四部備要·子部》，卷15，頁2-3。

王。

在以上五例的句法結構上顯著的特點是，在此全部的用例中「百里」和「天下」構成一組，並且讓讀者理解此五例中「百里」的國家之預設是這些國家成為治理「天下」的國家這一點。至少在荀子政治哲學的理論上，一個國家規模從「百里」開始，經過以荀子所提倡的德目和政策的實踐為條件，擁有會成長為「天下型」國家的目的以及動態。

到此，令人想起的情況是，其實《孟子》中也有「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梁惠王上〉，卷1，頁7）等例子。關於戰國早中期諸子文獻的「天下觀」問題，筆者欲在另一文章詳論；而在此讓筆者僅就於指出孟子對只擁有一百里之小諸侯在他自己的治世中能當「天下之君」實際上會相當困難這一點作說明。其實，荀子自己也面對當時的小國諸侯，假設其真的擁有如商湯王、周文王、武王這樣德望的話，在他治世中實際上是否能成為「天下之君」這一點，我們也無法得悉。不過，在這裡我們還是可以關注荀子的「天下」概念確實具有德望的國君最後能提升為「天下之君」的動態。

那麼，荀子「天下」概念構想下的國家含有必然會成長的動態這一點，具體以何種方式呈現於《荀子》的政治主張呢？到此我們關注的是與「天下」一起出現的豐富的動詞（請看【附表】相關部分）。在這裡，對符合荀子所提出的道德標準之國君而言，也就是說，對荀子所界定的理想的統治者而言，「天下」自然成為可以「取」、可以「制」、可以「治」、可以「合」、可以「一（齊一、調一）」的對象。在整本《荀子》中「一（齊一、調一）天下」的句子就出現多達13次（包含「壹天下」的用例則總共16次）。正如《墨子》「治天下」一詞，其用例中也含有主語為古代的先王或聖王的情況，⁵²但正如「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非相〉，卷3，頁5）的例子，在荀子主張「治理天下」的行為時，荀子自己關注在不久未來會有不同於周王之新帝王出現來實現的可能性，而這樣的帝王與對「天下」只能「威動」（〈王霸〉，卷7，頁3）的五伯有明確的區別。⁵³

⁵² 在整本《墨子》中「治天下」一詞出現30次。其數量並不少，但其大部分的主語為先王或「古聖王」，如「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戰國〕墨翟：〈尚賢下〉，《墨子》，《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卷2，頁11。

⁵³ 〈王霸〉曰：「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戰國〕荀況：〈王霸〉，《荀子》，《四部備要·子部》，卷7，頁3。

戰國諸子文獻中，商湯王和周武王從一百（或七十）里的小諸侯開始最後成為治理天下之君的論述，在《禮記》（大戴、小戴皆是）、《墨子》、《老子》、《莊子》、甚至《呂氏春秋》（容後詳述）中都沒有出現。引述內容和動機（提倡「商湯周文武之德」）符合《孟》、《荀》的引述意涵之用例僅僅在《韓非子》〈姦劫弑臣〉的「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⁵⁴和《管子》〈形勢解〉的「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而已。⁵⁵其實，《韓非子》還有另一條例子。〈五蠹〉介紹周文王之「仁義」，即說：「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五蠹〉，卷 19，頁 2）然而韓非將此例子與此將徐偃王的「行仁義」相比較，韓非竟藉以舉徐國最後被怕其擴張的楚文王討滅的故事來主張「行仁義」並不會幫助某一國的強盛。⁵⁶

雖然在戰國諸子的文獻中也出現商湯王和周武王從百里小國取天下的故事，而這意味著，此種傳說當時廣闊地流傳而為許多戰國諸子普遍所悉。然而在此故事除了《孟子》和《荀子》之外的文獻（甚至包括《禮記》）中很少出現的事實，會引導我們推測此故事在《孟子》和《荀子》的國家觀中可以說是最能發揮和其思想功能。至少《孟子》和《荀子》將此歷史記憶在幾乎為同一個論述目標來使用——「提倡仁義的功用」。不過，若我們仔細比較《孟》、《荀》中出現的全部用例中之用詞和內容，我們也能夠發現，在《孟》、《荀》之間引述此「百里之國」的故事之論述前提和脈絡之間也有相當大的差異，筆者將之分成兩點。

第一、在《荀子》與「百里之君」的相關論述中，有其究竟目標不僅為諸侯國本身的充實，而且此充實成長為「天下型」國家的建立，也就是說由此國家來

⁵⁴ [戰國]韓非：〈姦劫弑臣〉，《韓非子》，《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卷 4，頁 17。大量引用，下文卷數篇章補充在文後。由於此句後面有「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此「百里」的例子則是為了提倡「忠臣」的重要。

⁵⁵ [戰國]管仲：〈形勢解〉，《管子》，《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年），卷 20，頁 13。若只是強調商朝和周朝從小領土開始的脈絡的話，還有《商君書》〈賞刑〉的「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一句。[戰國]商鞅：〈賞刑〉，《商君書》，《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卷 4，頁 6。

⁵⁶ 〈五蠹〉的原文如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引用[戰國]韓非：〈五蠹〉，《韓非子》，《四部備要·子部》，卷 19，頁 2-3。

達成一統天下之預設。對此孟子雖然與梁（魏）襄王的對話中揭破天下將會「定于一」，⁵⁷但當時在實際問題的討論中，「百里之國」是否能取天下這一點並沒有那麼樂觀。譬如，在〈梁惠王下〉孟子將其規模相當於「方五十里」的滕國描述為「善國」，⁵⁸但針對其國君能否當「王者」時，在當今的國君需要「為善」的前提下，還要等到其「後世子孫」。第二、荀子在闡述理想的國家社會制度和政治運作的時候，表面上似乎談諸侯國，但其主語往往是「天下之君」，也就是說實際上提倡天下一統後的「天下型國家」的藍圖。相形之下，《孟子》談理想國家的境界時所提出的「施仁政」、「為政於天下」、「朝諸侯」⁵⁹等主張內容也不會超過一個諸侯國層次能實行的政策的範圍。

（3）為了建立「天下型國家」的「大儒」的關鍵角色：在戰國諸子文獻的用例當中，治理或達成建立「天下型國家」的主題是君主。《郭店楚簡》〈唐虞之道〉、《莊子》〈逍遙遊〉、《韓非子》〈十過〉等的堯；《論語》〈泰伯〉的舜、《呂氏春秋》〈適威〉、《管子》〈法法〉等的舜；或者《墨子》〈尚賢上〉等堯和舜；《商君書》〈算地〉、《呂氏春秋》〈誠廉〉的神農；或《黃帝帛書》〈果童〉的黃帝等。⁶⁰相比而言，就在《荀子》中與「天下」一詞出現的帝王的名字而言，與其他文獻相比，在《荀子》中對堯、舜以及禹的描述本身並不少（個別為堯 49 次；舜 52 次；禹 59 次）。不過即便合計其全部用例，敘述他們治理天下本身的内容並不多：在整本《荀子》的 373 次的「天下」一詞用例當中，以此三帝王為主語來描述他們治理過天下的内容之文字僅有七例而已。⁶¹尤其帝禹雖

⁵⁷ 〈梁惠王上〉：「孟子見梁襄王。……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引用自〔戰國〕孟軻：〈梁惠王上〉，《孟子》，《四部備要·經部》，卷 1 下，頁 1。

⁵⁸ 〈滕文公上〉：「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同前註，〈滕文公上〉，卷 5 上，頁 2。

⁵⁹ 孟子從「朝諸侯」一句想像的大概是在〈梁惠王上〉中的「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的情形。同前註，〈梁惠王上〉，卷 1 下，頁 3。但在孟子的思維中，並沒有要制定王者對朝見自己的國家的諸侯國之內政制度的想法。這一點與從頭思考治理「天下」的制度之荀子大相逕庭。

⁶⁰ 至於《老子》，雖然《老子》中「天下」一詞的用例其實相當豐富（57 次），但由於《老子》整本中並沒有任何固有名字，「天下」一詞也沒有與具體先王或聖王名稱一起出現。

⁶¹ 其全部用為如下：（1）「夫堯舜者一天下也」〔戰國〕荀況：〈王制〉，《荀子》，《四部備要·子部》，卷 5，頁 11。（2）「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議兵〉，卷 10，頁 11。〈正論〉，卷 12，頁

然在整本《荀子》中出現比堯舜還多，但完全沒有以帝禹為治理天下的內容上出現的用例。與此相對照的「天下」的用例是，如上所述，以「百里→天下」的句子敘述商湯王和（或）周武王討伐前朝的描述中出現。在此話題中出現的「天下」一詞的 11 個用例中，有 9 個句子是由「取天下」或「天下為一」等句子出現。⁶²

其實，在《荀子》與「天下之君」的相關論述中，有比其他戰國諸子顯現之特點。這就是荀子將周公也列為曾經治理過天下的君王之一。荀子在具有「大儒之效」之小題目的文段中敘述周公也當過天子。〈儒效〉曰：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儒效〉，卷 4，頁 1-8）

同樣在〈儒效〉，與「天下」一詞有關聯，荀子強調周公雖然「鄉有天下」（曾經治理過天下），但後來將王位還給成王，因而「今無天下」。⁶³在《荀子》中的其他地方，由於將周公並列其他古代聖王，荀子很顯然將周公列為君王之一。譬如，〈仲尼〉曰：「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仲尼〉，卷 3，頁 15）在〈王制〉「以一國取天下者」小主題的論述中，荀子舉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王制〉，卷 5，頁 12）並當作達成「以一國取天下」的「古之人」之例子。⁶⁴

不可諱言，在儒家的論述中，能征討周邊（的暴君）的權限，尤其是能具體

9。(4)「我（按：堯）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堯問〉，卷 20，頁 15。(5)「昔者舜之治天下也」，〈解蔽〉，卷 15，頁 7。(6)「舜授禹，以天下」，〈成相〉，卷 18，頁 4。(7)「昔者舜之治天下也」，〈大略〉，卷 19，頁 10。

⁶² 沒有提及「百里」而直接論及「武王伐紂」的是〈議兵〉的「是以……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一句。同前註，〈議兵〉，卷 10，頁 9。

⁶³ 〈儒效〉：「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同前註，〈儒效〉，卷 4，頁 2。

⁶⁴ 〈王制〉：「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同前註，〈王制〉，卷 5，頁 12。

舉出名字的帝堯到周武王等「天下之君」而已。在此，周公的角色通常被限制於幫助文王和武王，或一時為成王當了攝政這一點。相形之下，在〈王制〉：「以一國取天下者」的用例中，荀子在這裡竟不舉商湯王或周文武王，而單獨舉周公，並且大力讚揚他。大抵而言，在各家先秦思想文獻中，對周公的興趣並不大，除了儒家文獻之外，特別以讚揚目的而複數引述周公故事者只有《墨子》和《呂氏春秋》而已。其實，《論語》和《孟子》中對周公的讚揚只限定為他對周朝的協助角色，論及周公當天子的文獻只有《荀子》和《禮記》而已。⁶⁵

不過就在荀子的「天下」論視野而言，對身為「天下之君」的周公之讚揚似乎並非他的「儒效」論或「大儒」論的究竟目標。其實，在〈儒效〉中，除了周公之外，荀子還以兩種事例來說明「大儒之效」的內容。第一種事例就是孔子和子弓。其中關於子弓，由於子弓是只在《荀子》中出現的儒者，而我們完全不得知悉其生平和事跡，姑且不談。孔子則在〈儒效〉中出現兩次。第一個例子在於荀子被秦昭襄王問到了「儒無益於人之國？」（〈儒效〉，卷4，頁2）此聽起來相當含有對儒者相當輕蔑的提問的回答中出現。在荀子的回答中，他對「儒者」價值說明為「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同上註）接著，荀子介紹孔子，而說明孔子當過司寇時魯國的風俗曾經大大改善。不過，正如荀子說「儒之為人下如是矣」（同上註，頁3），此事例為身為臣子的「儒」之說明，而針對「其為人上」的「儒」，荀子說此種「君子」的「義信」是「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同上註）。

我們還可以先看一個例子。這是在從「彼大儒者～」開頭的一段中出現，而荀子將「大儒」的優點以大概兩百字左右來描述，而在此結句說道：「仲尼、子弓是也。」在如上與秦昭襄王問答的說明中呈現稍微不一樣意涵的地方是，因為在這一段的「大儒」同時係指孔子和子弓這一點無疑，因此沒有提及「王公之材」或「其為人上」的「大儒」說明，此大儒是「莫不願得以為臣」的人。然而一位國君若能聘用到他，「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答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同上註，頁9）的「大儒之徵」將呈現出來。換言之，此「大儒」能代其國君，將他的國家從一百里的小國成長為「齊一天下」的境界。

⁶⁵ 〈文王世子〉和〈明堂位〉以「踐阼而治」、「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等句子來敘述周公當過天子的位子。〔戰國〕荀況：〈文王世子〉，《荀子》，卷6，頁15。〈明堂位〉，卷9，頁18。〈禮運〉的作者對「小康」的說明中則將周公也列為「不謹於禮」的六位「君子」之一。其他君子為禹帝、商湯王、周文、武王以及成王。

到此，我們還要觀察荀子在〈儒效〉中的說明，除了周公、孔子以及子弓之外，與「大儒」聯想的例子。這是在荀子為了說明「大儒之效」的比喻中出現。這就是造父和羿。荀子在用對造父的輿馬和羿的射箭之絕技的讚美說明「大儒」治國之功效。我們引述全段文字，荀子曰：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也。（〈儒效〉，卷4，頁9）

在這裡，荀子為了說明「大儒」之功效，使用兩次「百里」和「天下」兩個術語。而且在結句中，以相當強的口氣斷定說「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的話，不值得稱上「大儒」。

總之，如上針對〈儒效〉的「大儒」這一詞的分析，我們釐清了如下兩點：第一、雖然荀子所提倡的「大儒」理論上會是國君或諸侯本人的可能，從其與周公和孔子的聯想來看，荀子將之看作在一國中最寶貴的臣子之謂，大概係掌握國政大權的相國之類。第二、荀子所描述的「大儒」（周公和孔子以及以造父、羿的比喻），不但能夠安定其國政，而且都是能夠將「百里之地」這樣小國的君主也成為「一天下」的人物。

雖然周公本人並非從「百里之地」取天下的君王。不過正如〈仲尼〉有「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故道豈不行矣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仲尼〉，卷3，頁15）的一句所說，荀子將周朝的取天下過程描述為從文王的「百里」至成王的「天下一」之過程。而且對荀子而言，在此過程中「惡天下之倍周也」之危機時，「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儒效〉，卷4，頁1）的周公之舉，可以說是建立之後周朝繁榮之基礎。其實，荀子將周公和與孔子、子弓屬於同一類型或水平的人，〈非相〉有「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非相〉，卷3，頁2）的一句。筆者認為，荀子如上所述對周公之讚美，以及在「大儒」的類型中包含周公、孔子以及子弓的意圖相當清楚的。在荀子本人所面對的戰國世局，由於「百里之地」是一位統治者保持一個獨立國家的最小極限，荀子說「百里之～」

係指「任何諸侯國也能」的修辭，而「大儒」則係指繼承周公和孔子（以及子弓）的某一個儒者之謂，若當時哪一國能聘用他，即便其國家的領土僅有一百里小，此國家勢必達到為能「取天下」的成果。荀子並不敢說當代的「大儒」就是荀子他本人，但我們可以理解，荀子藉以「大儒」概念的提出相當清楚地表述戰國世局由他的理想藍圖導向於一統天下。

到此，有關《荀子》的「天下」概念議題中，剩下要討論的議題是，在荀子活動時「四世有勝」（〈議兵〉，卷 10，頁 9）的秦國是否有資格在段時間內達成「取天下」之舉呢？為了這項問題的釐清，我們需要與《呂氏春秋》的觀點比較，因此下面我們將先分析《呂氏春秋》的「天下」概念。

三、《呂氏春秋》的「天下」概念

在整本《呂氏春秋》中「天下」一詞出現 273 次，與出現六次的「四海」一詞一起考察時，便能夠發現其與《荀子》的「天下」概念相當不同的面向。首先，與「人類本位」的思考與政治共同體的意義較為濃厚的《荀子》「天下」觀的思想特色相比，在《呂氏春秋》對「天下」世界的描述中，其作者們也提出比較清楚的地理環境的概念。雖然其描述並沒有直接以「天下」一詞來表達，《呂氏春秋》的作者也以「四海」之名稱將「天下」世界表示實為人類和其他生物所生存的領域這個事實。〈有始〉曰：

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有始〉，卷 13，頁 3。）

眾所周知，在〈有始〉很仔細的載錄天下地理的描述。其實，《呂氏春秋》也關注在其環境居住的人族。正如在〈恃君〉所述，其作者針對居住於「天下」領域的人族有相當清楚的理解。〈恃君〉將「天下」的邊界由「非濱之東」、「揚、漢之南，百越之際」、「離水之西」以及「鴈門之北」來觀察這些地區的人民「多無君」的情況，而「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以期「天子利天下」（〈恃君〉，卷 20，頁 2）。如下所述，在《呂氏春秋》的「天下」觀與對「天子」

的視野中，⁶⁶其作者們所關注的是「天子」對治理「天下」上的各種角色，而不像《荀子》以商湯王和周文、武王的用例描述他們從「一百里之地」的小諸侯最後成為「天下之君」的過程。也就是說，《呂氏春秋》從頭到尾關注的焦點在於「天子」這個地位的人需要實行的具體角色和言行。

（一）與《荀子》的「天下」概念的異同

在這裡，我們先探討在《呂氏春秋》的「天下」概念之用法中，與其他戰國諸子文獻中的用法相比，比較接近於《荀子》用法的部分。《荀》、《呂》兩者的「天下」概念之間共同，並且與其他諸子相區分的地方應該在於：無論其意涵在理念上或實際上，《荀》、《呂》兩者比當時的戰國諸侯，原來就關注「天下之君」的存在，以及其對治理「天下」世界的關鍵角色。譬如說，《荀》、《呂》兩者的論述雖然也並不忽視一國的君主善治他的「國家」之重要，但在許多論述中，《荀》、《呂》兩書藉以使用「天下」一詞，直接描述「天下之君」如何治理「天下」。與《荀子》將此「天下之君」成為「聖王」、「後王」、「天子」等多樣名稱相比，《呂氏春秋》則主要使用「天子」和「聖人」兩個術語。⁶⁷再說《呂氏春秋》思維方向針對如何治理不久未來的天下這一點。下面，筆者先欲提出《呂氏春秋》的相關論述從頭以「天下」視野進行撰寫的事實。

若我們在《呂氏春秋》的相關論述中，就其題材來自於其他戰國諸子文獻的內容，來比較分析兩者的用詞和內容之間的差別，便能夠理解《呂氏春秋》各篇章的作者們將原來可能僅討論治理一國的議題，還擴大為治理天下的議題之傾向。在這裡筆者想舉兩個例子。首先要舉的例子是〈慎勢〉中的「分」論。〈慎勢〉的作者先引述慎到說：

⁶⁶ 與《荀子》以各種方式稱呼治理「天下」之君主相比，《呂氏春秋》的作者們以壓倒性的數量（144次）使用「天子」一詞。其中在〈十二紀〉中「月令」所描述的「天子」角色部分出現54次。這意味著，《呂氏春秋》在其論述部分也使用90次的「天子」。相形之下，在《荀子》中則「天子」一詞出現51次。不過其中4例是從《詩》引述，而在〈禮論〉、〈大略〉等將近20則是所謂周朝「禮制」制度中的「天子」的角色規定相關。

⁶⁷ 使用「天子」的例子在「十二紀」中非常多。在《呂氏春秋》中「聖人」的角色主要在於管理人類和萬物生命的調和上。若比較政治涵義比較濃厚者，譬如在〈精通〉的「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等用例。〔戰國〕呂不韋：〈精通〉，《呂氏春秋》，《四部備要·子部》，卷9，頁9。

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慎勢〉，卷 17，頁 15）

關於慎到的此段話，在《慎子逸文》中也留有如下一段，即說：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⁶⁸

雖然在此兩者的用詞和修辭方式之間有一些差異，但兩段同樣提倡「定分」的重要這一點是無疑的。不過，在〈慎勢〉的論述中，如上引文最後一句的「人雖鄙不爭分」之後面還加上「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的結語。由此，〈慎勢〉作者的問題意識很明確是：是否達成「定分」為治理天下的關鍵。換言之，這一段的主題從原來針對「治國」層次的議題提升為針對「治天下」層次的議題。

接著，第二個例子是在《呂氏春秋》中對「一」這個概念的用法中可以觀察到。〈大樂〉即說：「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為聖人」（〈大樂〉，卷 5，頁 5），而這一段話意謂著，君王為了治理天下要「執一」的方法施政。也就是說，與〈慎勢〉的「定分」論理路一樣，「一」概念被用來使用於「治天下」的議題上。按照此理路，在《呂氏春秋》中也有「~的話，可以~天下」的句型，此種用例在《呂氏春秋》中相當多。譬如，〈用眾〉曰：「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用眾〉，卷 4，頁 9）、〈先己〉也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先己〉，卷 3，頁 7）、〈適音〉亦云：「法立則天下服」（〈適音〉，卷 5，頁 7）。簡言之，《呂氏春秋》無論論述什麼問題，在此背後都有對如何治理「天下」的問題意識。

假設我們也注意《呂氏春秋》的作者以何種文獻架構討論「天下」問題，我們也能發現到，在〈十二紀〉前三部分中個別位在最前面部分的〈孟春紀〉、〈仲春紀〉以及〈季春紀〉之個別屬第一篇的〈本生〉、〈貴生〉、〈盡數〉均從「天子」或「聖人」（即能夠治理天下的人之象徵）的敘述開始。其實，這樣的論述

⁶⁸ 〔戰國〕慎到，〔清〕錢熙祚校並輯逸文：《慎子逸文》，《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

安排似乎與《呂氏春秋》各篇的作者以闡述治理天下的方法為優先之撰寫意圖密切相關。⁶⁹具體而言，〈孟春紀〉、〈仲春紀〉、以及〈季春紀〉的論述均由治理天下的問題開始論述。如此，在〈慎勢〉和〈大樂〉的例子中，將原來音樂論和分配論的探討與治理天下問題聯結起來。總之，幾乎在每篇或每部分，這樣「治理天下」的問題不斷浮現起來，而這就是《呂氏春秋》作者之撰寫的主軸。

那麼，下面我們也將探討《呂氏春秋》「天下」概念中與《荀子》不同地方的思想特色。為了行論的方便，我們將探討分為語法和內容兩部分來進行。首先，從語法的角度來看，《荀》、《呂》「天下」概念中比較顯著的差別應該在於「天下」一詞成為賓語時的動詞之選擇上。正如【附表】所示，《荀子》和《呂氏春秋》之間，將「天下」一詞取賓語的動詞各有不同的傾向。在《荀子》使用「天下」一詞時，多取「一」、「壹」、「（橫／遍）行」、「動」、「合」、「取」等動詞。荀子藉此敘述理論上一個諸侯國發展為「天下型」國家的過程。具體而言，至少在理論上，原本一個「百里之地」小國的國君，倘若像過去商湯王和周文、武王的例子般，努力躬身實踐荀子所提倡的德目和政策的話，這一位國君經過如上動詞所敘述的方式最後將能夠成為「天下之君」。

相比而言，在《呂氏春秋》中在取賓語的「天下」的動詞中，如上「取」、「一」、「壹」、「（橫／遍）行」、「動」、「合」等動詞卻完全並不出現，在《呂氏春秋》中出現的則是「王」、「正」、「有」、「治」、「安」、「理」、「知」、「慮」、「託」、「為」等，會係指「管理天下之政」的意涵比較濃厚的動詞。在如上所舉的動詞中，「王」、「正」、「理」、「知」、「慮」、「託」、「為」⁷⁰等，在《荀子》中均完全不出現。在《荀》、《呂》兩本中都出現的動詞是其本身具有「治理天下」意涵的「有」、「治」、「安」、「定」等。那麼，這樣用詞上的差別，在與「天下」相關議題上告訴我們什麼情況呢？荀子所使用的幾個動詞，如「取」、「一」、「合」的前提是，當今尚未達成此動詞所描述

⁶⁹ 其文段個別為〈孟春紀·本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天子。」〔戰國〕呂不韋：〈孟春紀·本生〉，《呂氏春秋》，《四部備要·子部》，卷1，頁4；〈仲春紀·貴生〉：「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卷2，頁3；〈季春紀·盡數〉：「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卷3，頁4。

⁷⁰ 在《荀子》中將「為」取動詞的用法都是「為天下～」的用法中。譬如「為天下大僂」，〔戰國〕荀況：〈非相〉，《荀子》，《四部備要·子部》，卷3，頁3；「為天下大笑」，〈彊國〉，卷11，頁4。

的狀態。譬如，荀子在使用「取天下」時，此「天下」還沒有達成「被取得」的結果。再者，若我們還考慮荀子幾次強調「百里之地」的小國也有可能未來能「取／一／合天下」的話，就荀子的構想來說，當時存在的任何諸侯都有「取天下」的條件。

相形之下，在《呂氏春秋》中則並沒有出現「一天下」一詞，而且僅出現兩次的「取天下」一詞也並不具有正面的意涵，而「一」字和「天下」一起出現的例子則是「以一治天下」。在《呂氏春秋》中相對地出現比較多的句子是「治天下」的13次。在「治天下」的用例中，其中大概在以「先王」、「帝堯」等為主語來敘述古代治理情況的文句中出現，並且這些用例中比較明顯的思維是：在思考如何治理天下時，務必向古代聖王的故事取經這一點。⁷¹

上面我們從《荀子》和《呂氏春秋》中有關「天下」一詞出現的語法，特別關注取「天下」一詞的動詞用法來初步探析《荀》、《呂》兩者對國家的成長和治理的問題之基本立場：《荀子》鼓勵小諸侯讓他的國家成長，以期他有一天將成為「天下型國家」的君王；《呂氏春秋》則從頭關注一位「天子」治理「天下型國家」。那麼，下面我們將進一步檢驗《呂氏春秋》「天下」概念的思想特色，尤其是與《荀子》並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要提出來的是，如上所述，《呂氏春秋》並沒有對一個國家的領土擴張引起特別的興趣。這一點在其對商湯王、周文王以及周武王的相關論述中相當明顯。在這裡我們以周文王和周武王相關的敘述為例來觀察此思想傾向。首先看周文王的例子。在〈順民〉中其作者所描述的周文王是不顧千里大的領土的有德國君。〈順民〉說：

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順民〉，卷9，頁4-5）

在引文中會令人矚目的一點是，異於《荀子》中從「百里之地」開始的諸侯之形象，這裡的周文王謝絕商紂王要授予千里大的封土。在這一段的故事構成上，值

⁷¹ 在《荀子》中「治天下」的用例有五條，而其中三條的主語為帝堯（一條）或帝舜（兩條）。

得注意的一點是〈順民〉的作者還說明「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但文王徹底理解「必欲得民心」。在這裡，作者和讀者的共同前提是周朝將取代商朝，而在此前提上，作者暗示周朝之所以能夠取代商朝的關鍵是其努力並沒有放在擴大其領土上，而是在贏得民心。

接下來我們看周武王的例子。其實，在整本《呂氏春秋》的內容中，描述商湯王和周武王的軍事行動並不少。然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呂氏春秋》的作者描述這樣的軍事行動時，通常將此舉動描述為「討伐」，而很少將之以「取得天下」的脈絡論述。⁷²我們無妨檢驗〈簡選〉對周武王克殷相關的敘述。〈簡選〉即說：

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

在引文的解讀中先要注意的是，〈簡選〉的作者並不認為「禽商紂」的周武王藉此自然提升為「天子」；〈簡選〉的作者接下來還描述武王實施種種德政之後，在「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的結果，周武王才能「故立為天子」。

如上所述，《呂氏春秋》的作者敘述周文王和武王的相關故事中，並沒有將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他們的領土大小和「取天下」的成功與否；而放在他們兩位努力於獲得民心這一點，而從這一點可以觀察出的《呂氏春秋》各篇作者們的意識是，其作者們所想像的統治者（大部分以「天子」，部分由「聖人」來表達）要達成的目標，在第一意義上並非是領土的擴張，而是要達成完善治理天下的機制以及獲得天下人民的擁戴，而這就是為了當「天下型國家」的君王之首要條件。

那麼，在《呂氏春秋》的作者描述如何治理他的「天下型國家」時，若並不要求此統治者發揮「取天下」的積極作為的話，他們對「天下之君」的要求是什麼？筆者認為是如下三項德目的實踐。

第一是「養生」。在《呂氏春秋》對理想的君王的描述中，令人覺得相當有

⁷² 〈古樂〉：「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戰國〕呂不韋：〈古樂〉，《呂氏春秋》，卷5，頁10。〈簡選〉：「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卷8，頁6。

意思的情況是，尤其在「十二紀」的幾段論述中可以觀察到。我們以〈先己〉中所展開的論述來看，〈先己〉曰：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耑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賡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先己〉，卷3，頁5-6）

統治「天下」的君王先要顧慮自己的身體之論調在〈貴生〉中也明顯。在開頭，作者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貴生〉，卷2，頁3）接著，〈貴生〉的作者舉「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同上註）而被子州支父重視身體之餘「未暇在天下」（同上註，頁4）的故事。到時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貴生〉的作者當然並非簡單讚揚子州支父重視貴生的態度，否則此段的論述並沒有提供給秦主的意義。因此，作者的重點在於此段結論的「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一句。如此，在中間一段，〈貴生〉的作者反覆此論點說：「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同上註）⁷³

第二是「求賢」。其實，在《呂氏春秋》中的「尚賢思想」非常明顯，感覺不需要在這裡還特別提出來。因此，在這裡將筆者要探討的論點限於《呂氏春秋》的作者對「尚賢」的追求比擴大領土需求還高的特點上。我們來看兩個例子。先看〈分職〉的如下論述：

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分職〉，卷25，頁6）

乍看之下，這一段顯然是呼籲統治者「尚賢」的重要，而筆者之所以選這一段的理由是，此段中「取天下」一句也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分職〉的作者在此一句的前面即說：「然而世皆曰」，也就是說，在此「世皆」一句反而表示〈分職〉的

⁷³ 不過，我們也需要注意：在《呂氏春秋》針對「天子」的養生還有「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的意涵。〔戰國〕呂不韋：〈情欲〉，《呂氏春秋》，《四部備要·子部》，卷2，頁7。

作者似乎並不太認同「武王取天下」的說法。藉此〈分職〉的作者似乎主張，周武王所謂「取天下」之舉在聘用到五位賢人時就幾乎已經注定的。

第二個例子是在〈不侵〉中秦昭襄王和百里之小國薛的孟嘗君之「士」公孫弘的對話。由於在其描述中的反面教師為秦昭襄王，對《呂氏春秋》的作者們而言，這一段可代表秦王要自鑑的意涵。在秦昭襄王以輕蔑之意，與公孫弘進行如下對話：

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
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不侵〉，卷 12，頁 9）

公孫弘的回答是「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而說明孟嘗君的下面有三位「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慚為人君，不得意則不厲為人臣」、五位「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以及七位「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的士人。之所以《呂氏春秋》的作者放進這一番故事的理由也是，他們相信在編輯《呂氏春秋》時的世局中，秦國所需要的政策並不在於再展開擴大其龐大領土，而是從天下盡量招聘賢良之士。如此〈觀世〉呼籲統治者為了「欲求有道之士」，在「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觀世〉，卷 16，頁 4）都要努力尋找。

第三是「至公」。因為筆者曾經詳論過《呂氏春秋》的「公」概念，⁷⁴正如「尚賢」的討論一樣，本文只針對其「天下」概念相關的問題提出幾個筆者的觀察。其實，《呂氏春秋》的作者提倡「至公」的重要這一點部分說明在「天下」概念相關的論述中。為什麼《呂氏春秋》的作者並不是用與「取得」或「獲得」相關的動詞來談起治理「天下」的問題，我們先看〈貴公〉的如下論述：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貴公〉，卷 1，頁 9）

⁷⁴ 請參閱佐藤將之：〈《荀子》和《呂氏春秋》的「公」概念〉，《政治科學論叢》第 85 期（2020 年 9 月），頁 21-33。

〈貴公〉的作者在此一段的結論部分也曰：「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作者的意思似乎是統治「天下」的君王，像天地一樣以無私的態度公平對待人民，而〈貴公〉的作者將此態度稱為「公」。另外一段，〈貴公〉的作者進一步闡述「公」的內容，即曰：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同上註，頁 8-9）

這一段最後「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的主張，正如〈簡選〉對周武王「立為天子」的故事一樣，在《呂氏春秋》談「天下之君」時的預設是，一個統治者光靠其兵力或經濟的力量來稱霸還不夠，為了他提升為真正的「天下之君」還要達成〈簡選〉脈絡的「萬民說（按：悅）其義」（〈簡選〉，卷 8，頁 6），在〈貴公〉脈絡的話，則是要建立「公」的治理原則。到此，既然「公」之德的實踐代表以某種程度放棄自己可以壟斷的各種資源，而這與《荀子》要爭取「天下」的觀點可站在其對稱點。其實，在《荀子》和《呂氏春秋》對「天下」概念如此顯著的差別之同時也可能代表他們兩者對世局問題的觀點，尤其是對秦國是否能治理「天下」的問題之看法的差異。下面我們將探討這個問題。

四、在《荀子》和《呂氏春秋》的天下觀的思想特色

基於如上的論述所闡明的，本文最後將要探討的問題必然會是《荀子》和《呂氏春秋》天下觀的思想特色。過去以來，筆者主張《荀子》與《呂氏春秋》兩書的基本思想特色，在於以超過戰國時代當時個別並存的諸侯國的視野，思考如何建立包含天下所有人民的大一統國家之理論這一點。在此兩書中「天下型」國家的藍圖均具備如下三個共同的思想特色：第一、《荀》、《呂》兩書所提出對人類的理解並非是屬於個別族群或階級，而是具備同樣身體功能和異於其他生物各種特質之整體人類。在其他先秦文獻中「人」概念的涵義不如《荀》、《呂》那麼清楚界定。第二、此兩書的養生論也基於全人類每個人的身體功能是一樣的前提來展開論述。第三、在「國家起源論」的探討當中，《呂》、《荀》兩書基

於對人類身體功能限制的理解而發展出「群」論。基於如此對「人」的理解，此兩書政治主張的重點從治理「某個地區的人民」或專屬被統治階層的「民」，變成「在生理屬性上具備一樣特色的總體人類」之轉換。而且，其治理對象的「人」還包含統治者本人的身體。按照這樣的邏輯，既然在「天下」居住的人都屬同類的「人類」的話，在《荀》、《呂》兩書的理路上，可以構成單一的「天下型」國家。

不過這仍然是在理論上的預設。為了實現這樣的天下藍圖，還需要有將此理想能夠推行到整個華夏世界的統治之單一政權。關於《荀》、《呂》兩書撰寫時期，比較確定的是《呂氏春秋》〈十二紀〉部分的撰寫應該在前 240 年代。《荀子》主要內容的撰寫則可能早一點開始。⁷⁵其實，在此前面的時期（即從前 250 年代）應該有導致荀子和呂不韋兩位開始具體構想天下國家藍圖的歷史事件。而且至少據筆者所悉，過去思想史家很少關注過這個歷史事件。這就是離此兩部著作出現於世之時期前並沒有很遠的前 256 年周朝和魯國個別被秦國和楚國征服之事件。因為周朝滅亡，天下「無天子」的狀況便出現。⁷⁶由於魯頃公被搬移至柯而薨，魯公室的祭祀也斷絕。⁷⁷如此，所謂「郁郁乎」的周文明之國家共同體也隨之從中原地圖上永遠消失。簡言之，從周朝和魯國滅亡的前 256 年到由秦國「最後」達成一統的前 221 年的三十五年期間，實為華夏文明的「天下秩序空白期」。我們以這樣的世局為前提，思考一番《荀》、《呂》兩書天下觀的思想特色。為了行論的方便，我們先看《呂氏春秋》作者（們）的觀點。

如上所述，《呂氏春秋》的作者從其論述的前提就預設一位天子要如何治理天下的問題。這個理由是很明顯的：《呂氏春秋》是當時秦國政治權勢最高之人——呂不韋——為了提供給「身為天子」的秦主以資他實踐如何治理天下之指南書。

⁷⁵ 關於此兩部著作內容或撰寫的時期，根據《史記》的相關記載，在《呂氏春秋·序意》也有記載呂不韋宣布「十二紀」的完成就在於「秦之八年」（241 B.C.或 239 B.C.），據此我們可以推定《呂氏春秋》的撰寫或編輯動機和內容應該反映前 240 年代的世局。荀子則在前 238 年聘任他的春申君黃歇遭弒而退休。關於其撰寫時期，請看下文。

⁷⁶ 由於呂不韋在前 254 年親自率兵完全滅掉周朝的殘存勢力，就此「無天子」狀況出現的原因而言，呂不韋本人也不外乎是主要當事人之一。

⁷⁷ 《史記·魯周公世家》：「（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為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西漢〕司馬遷著：〈魯周公世家〉，《史記》，《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 年），卷 33，頁 17。

既然在撰寫以及編輯《呂氏春秋》時周天子已不在，⁷⁸其中有關「天子」、「天下之君」、甚至是「聖人」的敘述之前提就是此實踐的主體為（效法先王的）秦君。也就是說，《呂氏春秋》的作者們期待秦王只要一步步實踐《呂氏春秋》所說明的施政內容，便能在近期未來被諸侯和天下萬民推戴為名正言順的天子。由是觀之，至少在秦廷內的話，這樣視秦王為「天下之王」的觀念，不用等到前 221 年一統天下之前，即在《呂氏春秋》的「天下」觀中應該已經成形。為此重要的是，既然在《呂氏春秋》作者們的眼界中秦主或多或少已經取代了周王的地位，並且於理念上「天下」領土和人民也都是屬於秦主的，其對「天子」職位的角色並不在所謂的秦一國的富強或擴大其領土，而是贏得天下諸侯和人民的擁戴，而藉此使秦主登上為真正的天子。這就是，《呂氏春秋》要求秦主主要以「養身」、「求賢」、「貴公」等能內斂積德的實踐，藉此讓天下諸侯和人民願意服從身為「天下之君」的秦君。

那麼《荀子》呢？首先，從原理來說，如上所述荀子認為只要具有百里之地的獨立諸侯都有資格在未來成為「天下之君」。並且在諸侯中只要哪一位能實行荀子所提倡的「禮治」等理想，他便會達成「取天下」或「一天下」的成就，這就是荀子所稱呼的「後王」。根據司馬遷的敘述，荀子在前 238 年由於楚春申君黃歇遭暗殺而解職（=退休），荀子本人的撰寫時期下限可推測晚至前 238 年左右。只是，若荀子活到前 230 年代，那他就已經歷秦國滅周一事，但卻不像《呂氏春秋》般記載「周已滅」、「無天子」等文字，⁷⁹在現存的《荀子》一書的內容中無法找出荀子直接提及周朝滅亡的記載。當然我們也不能否定現存《荀子》中與治理「天下」的君王相關記載之大部分是在 256 年前就已經寫成的可能性。不過若我們詳細看在〈疆國〉中所展開荀子對秦國的觀點，雖然是諷刺的口氣，但荀子也承認秦國的領土已「廣大乎舜禹（所曾經統治過）」；而其國家的威勢也「疆乎湯武」的現況。在此前提，荀子還說：秦朝臣的心理狀態為「認認然常恐天下

⁷⁸ 呂不韋編輯《呂氏春秋》時，是在呂不韋於前 249 年親自率兵消滅周朝之後沒有幾年，在當時，戰國七雄中秦國已成為獨強，而且周朝的九鼎在昭襄王時早已搬移到秦廷。因此當時的秦王的課題可以說應該進入讓「天下」將秦君擁戴為「天子」的階段。

⁷⁹ 〈謹聽〉：「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戰國〕呂不韋：〈謹聽〉，《呂氏春秋》，《四部備要·子部》，卷 13，頁 9-10。

之一合而軋己也。」⁸⁰甚至將其似無國可敵的軍事力也貶稱為「末世之兵」（〈議兵〉，卷 10，頁 10）。眾所周知，荀子的回答就是秦國必須實踐「義術」，而在這裡我們能觀察出荀子始終貫徹主張要治理「天下」的統治者之倫理要求的態度。然而在這裡筆者所關注的並非是這一點；而是荀子對「假設秦國真的實施義術」之後的敘述內容。荀子接著竟然主張：「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疆國〉，卷 11，頁 7）荀子之意就在於：只要荀子所提倡的「義術」落實於秦國對天下的政策，則秦王有資格「築明堂」、「朝諸侯」。⁸¹荀子如此允許某一個國家的朝廷內建築明堂、讓諸侯朝拜秦主，等於說他允許這一個國家可以向天下宣示他成為了「天下之君」。荀子對秦國這樣正面的看待，與其以嘲笑的口氣談論擁有六千里的大領土，但被「讎人（=秦國）役」的楚國大相逕庭。

82

在其整本論述中，荀子從來沒有具體針對任何其他國君表示其能成為「天下之君」的可能性。然而我們也可以得悉：荀子還說唯秦國未來會有能建築明堂的可能性。這意味著荀子在撰寫這一段論述的時候，已某種程度傾向於思考在當時所存在的戰國諸侯中，秦王處於最接近於實際成為「天下之君」的位置。

基於如上的觀察，我們最後也思考一番《荀子》和《呂氏春秋》中所提出的「天下型國家」兩張藍圖之思想意義。到此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會是：此兩張藍圖與在前 221 年後李斯和秦始皇在推進的「廢止封建」以及「推行郡縣」政策⁸³上有多接近，或是有多遠？為了將探討的焦點更清楚一些，或許我們能將此項問題換成為如下問題：《荀子》和《呂氏春秋》治理天下的藍圖是否比較接近於周初「封建制度」的理念，還是後來李斯推行「郡縣制度」的理念？假設我們注意一

⁸⁰ 此話也在〈疆國〉中出現兩次。但與〈議兵〉對秦「末世之兵」的描述聯想到「桀紂」的敗戰。〔戰國〕荀況：〈疆國〉，《荀子》，卷 11，頁 6。

⁸¹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戰國〕孟軻：〈梁惠王下〉，《孟子》，《四部備要·經部》，卷 2 上，頁 8。

⁸² 耐人尋味的是，在〈春申君列傳〉載：「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西漢〕司馬遷著：〈春申君列傳〉，《史記》，《四部備要·子部》，卷 118，頁 6。司馬遷的此記載暗示，春申君請荀子擔任蘭陵令，是楚國暫回勢的主要原因。

⁸³ 請參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如下的奏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同前註，卷 6，頁 10。

下《荀子》和《呂氏春秋》的作者們所擁有的政治權力（荀子=蘭陵令 vs. 呂不韋=相國／仲父）以及其兩書的撰寫方式（個人著作 vs. 集體合著）的兩個側面來看，⁸⁴至少乍看之下，《荀子》所指向「以推行禮制」構想的統治機構雖然應該是以「天子」為中心，但其權力構造應該是基於將實際統治權分配給各國諸侯的「封建制度」。相形之下《呂氏春秋》則似乎是藉以如「理」、「公」等比較抽象的統治理念來企圖建立具有強力政權的中央集權制度。⁸⁵

關於這項問題，筆者將此問題分為統治者本身的權力集中問題和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分配之兩個層次來試著提出若干鄙見。其實，從結論來看，就兩部文獻的作者們（荀子和呂不韋或他的「智囊團」）對「天下型國家」的統治者和朝廷要進行「權力集中」的預設均採取相當保留的立場。首先《荀》、《呂》兩書如何看統治者本人該擁有多大的權力之問題。眾所周知，荀子提倡「禮治」，而「禮」的規定本身也支配著統治者本人，而且其規定更是相當繁多。⁸⁶因此，將是靠這一點，至少在理論上荀子「禮治」政治哲學中的統治者所能行使的權力將會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⁸⁷其實，關於這一點，雖然在《呂氏春秋》的相關論述中很少出現「禮」概念本身，且沒有像荀子提出要直接由「禮」來治理「天下」般的主張。然而，若我們一看〈十二紀〉每季節首篇的敘述，這些就是「規定」天子在各個季節該做什麼的詳細說明。也就是說，〈十二紀〉的作者要求秦主為了提升為天子需要在整一年中按照〈十二紀〉作者所規定的朝廷規則來舉行國家儀禮，而如此才能期待朝臣和諸侯們能夠將他推戴為君臨天下人民真正的天子。⁸⁸

那麼，《荀》、《呂》兩書針對朝廷（=中央政府）如何支配地方政治單位的問題呢？關於這一項問題上，《荀》、《呂》兩書的立場其實完全互為一致。在《荀》、《呂》對「天子」所要統治天下的構想中，以「郡縣」方式治理天下的

⁸⁴ 關於這一點理解上，筆者感謝審查人的指點。

⁸⁵ 關於《呂氏春秋》「理」概念之普遍傾向，請參見佐藤將之：《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頁 188-192。

⁸⁶ 譬如，在〈大略〉中所列舉的禮制上對「天子」的各種規定。

⁸⁷ 也請參見佐藤將之：《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頁 268-274。

⁸⁸ 因此，宇野茂彥主張，呂不韋編撰〈十二紀〉的主要理由在於對秦主的統治權加以某種限制。請參閱宇野茂彥：〈呂覽の稱謂の由來——十二紀と八覽の天子觀の相違から見て——〉，收於村山吉廣教授古稀記念中國古典學論集刊行會編：《村山吉廣教授古稀記念中國古典學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頁 171-187。

想法完全不存在。其理由應該很容易推測。正如增淵龍夫迄今仍相當有影響力的研究所示，所謂「郡」和「縣」的設置是淵源於春秋時代諸侯國在攻滅政敵時為了統治新領土之需要所發展出來的制度，⁸⁹而在《荀》、《呂》兩書治理「天下」的構想中，天子所直接統治的近畿領域之外，其統治權基本上都交給諸侯。雖然在實際上天子直轄統治領域中可能存在著已成為「郡縣」的領土，但既然在要將周邊的廣大領土交給諸侯來治理的構想中，就不會有還要推行「郡縣」制度的想法。反過來說，之所以在前 221 年後李斯能夠主張推行「郡縣」的主要理由是，秦國所謂的「一統天下」（李斯語）⁹⁰是由秦國以壓倒性軍力完全攻滅周邊諸侯來達成這一點。也就是說，既然秦國長久以來以設置郡縣的方式治理新獲得的領土的制度。因此，哪怕是其新佔領的統治領域擴大及「全天下」，秦國原來的「獲得新領土」→「設置郡縣」的政策路線應該不容易由「一統天下」改變。與此相反，《荀》、《呂》理論中除了天子「問罪」的情況發生之外，原則上禁止天子對周邊諸侯發動軍事行動。再說，由於在此兩書的構想中靠攻伐周邊諸侯國來獲得領土的思維前提並不存在，由此構想的「天下型國家」政治秩序也當然是在「封建」的制度框架下維持。

總之，《荀》、《呂》兩書所提出治理「天下」的政治理論也可能對戰國時代最後世局已經開始發揮某種影響。具體而言，《荀》、《呂》所構想的「天下」論在第一意義上呼籲強國的諸侯不要訴求於武力。既從前 250 年代以後秦國獨強的勢力格局已經定形，此兩書也許基於如此世局的認知上呼籲秦國不要再動武增加天下人民對秦國的怨恨。如此，此兩書中這樣的論述立場從問世之後至少到前 232 年之前的十多年期間，⁹¹也許已某種程度發揮遏止秦國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的效果。

⁸⁹ 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東京：弘文堂，1960 年）。筆者所引述，為增淵龍夫著，呂靜譯：《中國古代的社會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347-357。

⁹⁰ 〈李斯列傳〉：「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四部備要·子部》，卷 87，頁 2。

⁹¹ 根據《史記》，從此年秦國全面展開攻滅其他戰國諸侯的政策。〈秦始皇本紀〉載「十五年，大興兵……。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秦始皇本紀〉，同前註，卷 6，頁 6-7。

結言

歷來過去對「天下」觀研究，除了針對專論中國古代「天下」觀的論述本身並不多的問題之外，學者們的關注也主要只在「天下」的領域範圍和所謂「華夏文明」的範圍相關議題。而且迄今幾乎沒人專論《荀》、《呂》兩書的「天下」觀。鑑於此，本文則試圖闡明《荀》、《呂》兩書如何以「天下」一詞建立在不久未來要實現於當時能構成最大規模的單一政治共同體——「天下型國家」。和其他戰國諸子的論述中有關治理「天下」的具體政策內容比較空泛或抽象的情況相比，兩書對「天下型國家」的論述不但相當清楚、詳細，而且具備條理和系統。本文所提出的心得則可歸納為如下兩點：第一、關於《荀子》「天下」概念的特色，荀子藉以「天下」相關概念的論述，提供給原有「百里」以上領土之全部諸侯，而其旨在於呼籲他們由於「禮義」、「忠信」等的實踐追求成為治理「天下」的統治者。這可以稱為具有「動態」的「天下型國家」觀。第二、《呂氏春秋》的相關論述則在前 256 開始的「無周天子」世局為背景而形成其主要內容。因此，就《呂氏春秋》的作者們來說，基本上並不存在秦國之外的國家治理「天下」的提問。《呂氏春秋》所界定的「天子」暗示秦主，根據《呂氏春秋》這樣的立場反而勸止秦君再追求增強國力的論述；而鼓勵以「養身」、「求賢」、「至公」等較為「消極的」方式來獲得天下人民的擁戴。換言之，《呂氏春秋》的目標在於讓秦君的地位從當今軍事上的「霸權」提升為天下人民心甘情願服從的「天下之君」這一點，而這可以說是「靜態」的「天下型國家」觀。

總而言之，過去學者對中國古代「天下」觀的相關研究有傾向於將秦漢時期以後「天下觀」的淵源直接與所謂「經書」如《尚書》、《國語》，或特定的戰國諸子文獻，如《墨子》的內容相連接，而幾乎沒注意過《荀》、《呂》兩書中「天下型國家」的藍圖有大力展開的事實。雖然我們也並不否定在經書和《墨子》等相關論述中也許可以找出秦漢國家「天下觀」的樸素概念或論述，但在秦漢之後的「天下觀」應該經過《荀》、《呂》兩書中理論化的過程，在其理論層次也好，實行層次也好，才提升為包含能夠長期安定地治理廣闊的領土之意識形態的政治理論。筆者期盼本文能夠闡述《荀》、《呂》兩書對在中國「天下」概念的展開所發揮的豐富思想內容和重要歷史角色。

【附表】《荀子》和《呂氏春秋》「天下」概念的賓語用法比較

荀子	篇名	備考	呂氏春秋	篇名	備考
橫行天下	修身 4 例			無	
遍行天下	性惡	2 例		無	
取天下	榮辱等	6 例		先己等 3 例	否定意涵
有天下	富國等 5 例 (其中 3 例 「富有天下」)	(不含「有天下之~」)		異用等 14 例	含 3 例「富有天下」
無天下	儒效 4 例			無	
動天下	非相等 3 例 (其中而 2 例「威動天下」)			無	
治天下	議兵等 5 例			貴公等 13 例	(含 1 例「治天下之要」)
平天下	成相		天下平 天下太平	貴公 大樂	
亂天下	非十二子			振亂等 3 例	
一天下	非十二子等 10 例			無	
調一天下	儒效 2 例			無	
齊一天下	儒效			無	
壹天下	非十二子等 2 例			無	
兼利天下	王制等 2 例；墨子中 無例		利天下	振亂 2 例	

兼制天下	儒效等 4 例；墨子中無例			無	
兼聽天下	王霸 2 例；墨子中無例			無	
兼覆天下	君道；墨子中無例			無	
			兼愛天下	審應	公孫龍子曰
合天下	儒效等 3 例			無	
得天下	儒效等 4 例			貴公等 3 例	
安天下	富國			論大	
定天下	堯問			士節	
一匡天下	王霸			勿躬	管子中有 3 例
用天下	正論 2 例			求人	
祿天下	榮辱等 2 例			無	
惠天下	君道	韓氏外傳有 1 例		無	
使天下～／使天下之～	非十二子等 6 例		使天下丈夫女子／使天下書銘	順說／審為	
天下歸之	儒效等 9 例	孟子·離婁上		愛類	
	無		失天下之士	舉難	
	無		理天下	長利	也有「天下理（勸學）」
	無		慮天下	貴生	
	無		託天下	貴生	
	無		正天下	順民	為天下正

					(君守)
	無		王天下	當染等 3 例	
	無	韓詩外傳有三例	知天下	君守	
	無	不含「為天下～」的句型	為天下	孝行等 6 例	
	無	《新書》和《新序》中各有 1 例	信於天下	貴信	
天下服	王制等 4 例			適音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時代順序）

- 〔春秋〕管仲：《管子》，《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年。
- 〔戰國〕孟軻：《孟子》，《四部備要·經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
- 〔戰國〕荀況：《荀子》，《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
- 〔戰國〕墨翟：《墨子》，《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
- 〔戰國〕慎到，〔清〕錢溪祚校並輯逸文：《慎子逸文》，《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
- 〔戰國〕韓非：《韓非子》，《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
- 〔戰國〕商鞅：《商君書》，《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
- 〔秦〕呂不韋：《呂氏春秋》，《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
- 〔漢〕司馬遷：《史記》，《四部備要·史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四部備要·經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

二、近人著述（筆畫順序）

（1）專著類

- 王柯：《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7年。簡體字版，請參閱王柯：《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04年。
- 牟復禮著，王立剛譯：《中國思想之淵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佐藤將之：《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

- _____：《參於天地之治：荀子禮治政治思想之起源與構造》，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 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增淵龍夫著，呂靜譯：《中國古代的社會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平勢隆郎：《世界の歴史2 中華文明の誕生》，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年。
- 平岡武夫：《經書の成立》，東京：全國書房，1946年。
- 田崎仁義：《王道天下之研究——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及制度》，東京：内外出版，1926年。
- 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觀——政治思想史的試論》，京都：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1956年。後亦收入於《元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年。
-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點から》，東京：校倉書房，2003年。
- 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東京：弘文堂，1960年。

(2) 論文類

- 于省吾：〈釋中國〉，《中華學術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甘懷真：〈「天下」觀念的再檢討〉，吳展良主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
- 邢義田：〈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恆的巨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
- 何新華：〈「天下觀」：一種建構世界秩序的區域性經驗〉，《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32期（2004年11月），
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409072.pdf>。
- 佐藤將之：〈《呂氏春秋》和《荀子》對「人類國家」構想之探析：以其「人」觀與「群」論為切入點〉，《政治科學論叢》第69期（2016年9月），頁149-182。
- _____：〈日本學者追求「觀念史」研究的固有歷史脈絡與三個契機〉，《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1期（2016年12月），頁3-21。

- _____：〈《荀子》和《呂氏春秋》的「公」概念〉，《政治科學論叢》第 85 期（2020 年 9 月），頁 21-33。
- 宋榮培：〈東方的「相關性思維模式」和對有機體生命的理解——以莊子和中醫的有機體生命原理為中心〉，吳展良主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
- 高明士：〈從天下秩序看中國古代的中韓關係〉，《中韓關係史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 年。
-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初探〉，《東吳政治學報》第 27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169-256。
- _____：〈戰國時期族群思想初探〉，《臺灣政治學刊》第 21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頁 1-56。
- 黃麗生：〈儒家「天下」思想的內涵及其當代意義〉，黃俊傑編：《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一）》，臺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 年。
- 趙汀陽：〈天下體系：帝國與世界制度〉，《沒有世界觀的世界》，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鄭吉雄：〈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吳展良主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
- 顧頡剛：〈畿服〉，《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 山田統：〈天下という觀念と國家の形成〉，增田四郎編：《共同研究古代國家》，東京：啟示社，1949 年。後收於《山田統著作集》，卷 1，東京：明治書院，1981 年。
- 王柯：〈三重の天下——中國多民族國家思想の起源〉，神戶大學《近代》1997 年第 82 號，頁 191-217。
- 西嶋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岩波講座世界歷史》，卷 4，東京：岩波書店，1970 年，後收入《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 1 卷，東京：岩波書店，2002 年。
- 宇野茂彥：〈呂覽の稱謂の由來——十二紀と八覽の天子觀の相違から見て——〉，《村山吉廣教授古稀記念中國古典學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0 年。
- 海野一隆：〈古代中國人の地理的世界觀〉，《東方宗教》第 42 號（1973 年 10

月)，頁 35-51。

游逸飛：〈評《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點から》〉，《新史學》22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245-254。

關口順：〈天下觀念の成立とその思想的意義〉，《埼玉大學紀要：教育學部》1999 年第 35 期第 1 號，頁 21-39。

Frederick W. Mote, “The Beginnings of a Chinese World View,” in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3-28.

三、網路資源

Donald Sturgeon（德龍）主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hinese Text Project）網站，網址：<https://ctext.org/zh>（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30 日）。

A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All-under-Heaven”
in *The Xunzi* and *M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Two Blueprints for ruling
the World during the “Post-Zhou-Lu”
Regime

Masayuki Sato*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elucid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ies of *The Xunzi* and *M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hereafter “LSCQ”) by means of a clos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use of the concept of “All-under-Heaven” (and other related concepts such as the “Four seas” etc.). A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ies proposed by these two texts and those of other Warring States’ masters can be seen in the fact that the former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world-wide political community rather than the mere stability of the state of a single feudal lord. In this sens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Xunzi* and *LSCQ* was not the expansion in power or territory of a single state, but rath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o-political order of the whole Chinese world, in another word, the installation of an order on a “world-scale,” which would theoretically be expected to rule the world from the beginning.

In more specific terms, this article argues the following the two points: First, Xunzi believed that any feudal lord of his time, if only he would make his best to improve the moral excellence in his personality, could become qualified to become the ruler of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aiwan National University.

Tianxia. Bearing this in mind, regarding the ques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ascendance of the Qin ruler to the position of ruler of *Tianxia*, Xunzi admitted a future possibility that the Qin ruler could have sufficient qualifications to do so, if only he practiced those skills which completely conformed to Confucian moral principle.

Second, the image of world ruler presented in the *LSCQ*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within which the text was created, a situation of “interregnum” (in which following the abolishment of the Zhou dynasty there was no Son of Heaven). As such, the text foresaw the ruler of Qin as being in the closest position to become the ruler of the Chinese world. On this precondition, the authors of *LSCQ* encouraged the ruler of the Qin to adopt more “passive” methods for winning the voluntary support of other feudal lords and people within the whole of the Chinese world, methods including “the nourishment of body and mind”, “recruitment of worth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virtue of fairness and impartiality.”

In sum, while generally speaking it has been postulated that it was 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that the *Tianxia* worldview which worked as the ideology to maintain vast territories and populations across great scales emerged, the present article posits that such a political philosophy wa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what *the Xunzi* and *LSCQ* propos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one considers the matter on a theoretical level in terms of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or on a practical level in terms of policy proposals.

Keywords: *Tianxia* Worldview, *The Xunzi*, *M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ll-under-Heaven”, “Four seas”

